

日本江戶時期古義學派對 朱熹淫詩說之批評

張 文 朝 *

提 要

本文旨在探究日本江戶時期古義學派學者對朱熹淫詩論之批評，以文本整理、歸納、分析、比較等為研究方法，選仁齋、梅鄰、東涯、東所、蘭嵎、三角、好古等學者之言論，分三大部分：一、古義學派學者對樂、聲與詩之論述，二、古義學派學者之淫詩觀，三、古義學派批評朱熹淫詩說對日本學界之影響，探討其淫詩觀及其對朱熹淫詩觀之批評，比較其與中國學者之異同，並述其說對日本學界之影響。結果顯示：持樂、聲與詩同，且認為有淫詩者，有仁齋、梅鄰，其餘為異，只有東所就詩本文解釋而認為淫詩為淫奔者自作。持同者，大多同於「皆始末之異名」；異者，則多將詩與樂置於六經之範疇下論之之故。就古義學說之繼承言，仁齋之後，古義堂以東涯之學說為主要教學論點，而古義學派學者引中國學者學說，如仁齋、三角，則用而不宣。東涯、蘭嵎、東所皆認同於田汝成，然蘭嵎偶有反思。好古大致選擇明、清學者中與己同意之論，蓋其以傳承古學為終身之志，堅採古義學派以《序》說《詩》之研究立場。古

本文於 105.12.27 收稿，106.11.15 審查通過。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DOI:10.6281/NTUCL.2017.12.59.03

義學派批評朱熹淫詩說之影響，於江戶初期有其特色，中期以後，除古文辭學派外，不見其他學派有引古義學派批評朱熹淫詩說者，故對日本學術界影響有限。

關鍵詞：江戶時期、古義學派、朱熹、詩經、淫詩

The Critiques of Zhu Xi's Love Poem Theory by the Ancient Meaning School Scholars in Japan's Edo Period

Chang, Wen-Chao*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itiques of Zhu Xi's love poem theory by ancient meaning school scholars that flourish during Japan's Edo period. The exploration is done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1) discussions of music, sounds, and poetry by ancient meaning school scholars, (2) their views on love poems, and (3) the influence of their criticisms of Zhu Xi's theory o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The methods used include organization, categorizatio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relevant texts by the Japanese scholars Jinsai, Bairin, Tōgai, Tōsho, Rangū, Sankaku, and Kōko. This study explores their views of love poems and their criticisms of Zhu Xi's views, compares them with Chinese scholars' views, and expound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ir views on Japan's academic circl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Jinsai and Bairin hold that music, sound, and poetry are the same and that love poems do exist 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res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ly Tōsho believes that the love poems are written by elopers. Scholars who have views similar to Jinsai and Bairin mostly deem that music, sound, and poetry are the same thing that carries different names for different stages. Contrary views often appear in discussions of poetry and music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Six Classics. In terms of influence on education, after Jinsai, ancient meaning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primarily take Tōgai's views. Bairin follows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Jinsai's views while Tōsho, Sankaku, and Kōko follow Jinsai's and Tōgai's. Rangū breaks the tradition and holds more views of his own. Jinsai and Sankaku use views from Chinese scholars without citing them. Tōgai, Rangū, and Tōsho hold views similar to Tian Ru-Cheng but Rangū occasionally rethinks his own views. Kōko mostly selects Ming and Qing scholars that have the same views as his.

The ancient meaning school critiques of Zhu Xi's love poem theory are influential in early Edo period. From the mid to the end of the Edo period, related criticisms can only be found in ancient wording school so at that time they are not very influential in Japan's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Edo period, ancient meaning school, Zhu Xi, *The Classic of Poetry*, *yinshi* 'love poem'

日本江戸時期古義學派對 朱熹淫詩說之批評^{*}

張 文 朝

一、前 言

朱熹將淫詩之定義規範為淫奔者自作之詩，並指出有二十餘篇淫詩，而產生之原因，乃在鄭、衛之自然環境造成其人稟氣所致。由此導入理氣論、心性論等論證鄭人人氣輕浮、人質柔弱、人心怠惰，以致其歌聲音樂亦淫靡，於是直接解釋孔子所言「鄭聲淫」即為「〈鄭詩〉淫」，以完成其淫詩論。直言之，朱熹認定《詩經》中有淫奔之詩存在。自從朱熹提出《詩經》中有淫詩的觀點後，引起當時呂祖謙等人的質疑與討論，明、清兩朝的言情小說甚至以朱熹的觀點，作為其合情合理的辯解說辭。¹ 時間與明末清初相當的日本江戸時期古義學派創始者伊藤仁齋（1627-1705）在朱子學上大致採取前尊後批的態度。

* 本文為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001-077- 之部分成果，感謝科技部資助本研究計畫。感謝三位匿名審查老師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¹ 相關論述，如林保淳謂：「《詩經》既可以有負面教材的『淫詩』，則自不妨世間存在同樣意義的『淫書』，這是明、清色情小說據以創作的理論基礎。」見林保淳：〈「淫詩」與「淫書」〉，《淡江中文學報》第4期（1997年12月），頁89。又如黃忠慎亦言：「當明、清的某些言情小說在發展過程中遭受到誨淫的斥責時，『淫詩說』自然成為言情文學的保護傘，與明、清淫誨文學之辨產生了必然的聯繫。」見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頁113。

那麼，面對朱熹的淫詩說，其態度為何？古義學派學者又如何批評朱熹的淫詩觀？而古義學派此批評之意義何在？此是筆者所要究明的問題。

截至目前，學界對此議題的相關研究成果大多是探討朱熹的部分，²但以「淫詩說」為題的並不多見。日本雖有種村和史〈詩を道德の鑑とする者——陳古刺今說と淫詩說から見た《詩經》學の認識の變化と發展〉一文，但此篇並非討論古義學派學者的淫詩觀，而是探討中國宋代朱熹解釋《詩經》基本上是排除漢唐思古說而提出淫詩說。然而朱熹對讀者讀詩時，要能得道德之鑑的要求，卻又與思古傷今說相似。³ 另外有數篇雖然不是針對淫詩問題的專著，但文中都略有涉及淫詩問題，如：清水徹〈伊藤仁齋的《詩經》觀〉；江口尚純〈伊藤東所之詩經學〉、〈伊藤東所《詩解》考略〉、〈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序說〉；張文朝〈仁井田好古的《詩經》觀及其對朱熹之批評〉。以上

² 例如：蔡根祥以為朱熹鄭風淫詩說，「既失依據，又失真實，而且對世道人心未必有益。」不過作者也認為朱熹要「呈現詩的真面目，而不惜大反傳統」的態度是可取的。見蔡根祥：〈朱熹詩集傳鄭風淫詩說平議〉，《孔孟月刊》第25卷第1期（1986年9月），頁21-25。賴炎元認為朱熹依據孔子「鄭聲淫」「放鄭聲」和〈樂記〉「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而提出《詩》中有淫詩，雖有當時呂祖謙從詩體的不同、雅鄭的不同、思無邪、孔子刪《詩》四點的反駁，又經元、明兩代學者的批評，但都不如清代姚際恆、陳啟源等從朱熹誤解「鄭聲淫」，來得正確。姚氏從聲與詩不同批朱，認為聲為音調，證明鄭聲非〈鄭詩〉。陳啟源進一步指出朱熹誤解「淫」字之意，指出淫是過度而不是專指男女之欲，「鄭聲淫」是指鄭國樂音超過常度，而失其中正和平的情致，作者認為陳氏的解說是可取的。最後作者認為朱熹難能可貴的看出〈國風〉中有二十四首男女情歌，卻又因道學家的立場斥之為淫詩，而淹蓋了其原來的面目，為之惋惜。見賴炎元：〈朱熹「淫詩說」考辨〉，《孔孟月刊》第31卷第7期（1993年3月），頁12-18。許雯怡從〈鄭風〉的史地背景、〈鄭風〉的詩旨，為〈鄭風〉既非淫詩亦非「鄭聲」平議，認為所謂「鄭聲淫」乃春秋時新生之過度感人之音樂，與《三百篇》之〈鄭風〉無關，而朱熹誤以為同，而有「鄭聲淫」即〈鄭詩〉淫之解。見許雯怡：《〈詩經·鄭風〉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文幸福先生指導，2011年）。

³ （日）種村和史：〈詩を道德の鑑とする者——陳古刺今說と淫詩說から見た《詩經》學の認識の變化と發展〉，《橄欖》第17卷（2010年3月），頁202-245。

各論文的相關觀點，將在本文中隨文討論。⁴可知，與本文相關的議題，在中、日學界尚未得到應有的注意，值得本文的研究。

朱熹淫詩說不只在中國深受議論，也在日本引發很大的爭論。以江戶時代的古義學派學者而言，淫詩說正是他們攻擊朱熹《詩經》學的其中一環。本文目的在探究日本江戶時期古義學派的學者對朱熹淫詩論之批評，而研究方法則以文本整理、歸納、分析、比較等為主，分三大部分：一、古義學派學者對樂、聲與詩之論述，此部分再分成（一）認為聲、樂與詩同者；（二）認為聲、樂與詩異者。二、古義學派學者之淫詩觀，此部分再分成（一）認為有淫詩者，（二）認為無淫詩者。三、古義學派批評朱熹淫詩說對日本學界之影響，以便論述伊藤仁齋、平元梅鄰（1660-1743）、伊藤東涯（1670-1736）、伊藤蘭嶠（1694-1778）、奧田三角（1703-1783）、伊藤東所（1730-1804）、仁井田好古（1770-1848）等七位古義學派主要學者在淫詩相關問題上的發言，⁵從他們的各原文著作中整理出來，於同部分依學者的生存年代先後，逐一探討其淫詩觀及其對朱熹淫詩觀之批評，以見其間之傳承與差異，並與中國學者比較異同，進而探討古義學派朱熹淫詩說之批評對大正時代以前之日本學界有何影響。最後，總結每位學者的觀點，從而看出各學者間的傳承、異同。

⁴（日）清水徹：〈伊藤仁齋的《詩經》觀〉，《東洋文化》第100號（2008年4月），頁12-26。（日）江口尚純：〈伊藤東所之詩經學〉，《詩經研究》第32號（2007年12月），頁1-8。江口尚純：〈伊藤東所《詩解》考略〉，《中國古典研究》第52號（2007年12月），頁1-9。江口尚純：〈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序說〉，《中國古典研究》第55號（2013年12月），頁46-56。張文朝：〈仁井田好古的《詩經》觀及其對朱熹之批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7期（2015年9月），頁173-216。

⁵根據各種書目總和古義學派中有《詩經》相關著作之學者為十八人，但經筆者至日本實地訪查結果，目前僅能收集到此七位學者之著作，故以此七位學者為論述對象。此七名學者之生平、傳略、著作，可參考張文朝編譯：《江戶時代經學者傳略及其著作》（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頁128-141。

二、古義學派學者對樂、聲與詩之論述

朱熹認為聲、音、樂與詩一體，故視鄭聲淫為〈鄭詩〉淫，而認為《詩》中有淫詩。此說對日本古義學派學者有何影響？或者說日本古義學派學者如何批評朱熹的淫詩說？以下分異同兩部分，論述古義學派學者對聲、樂與詩之觀點。

（一）認為聲、樂與詩同者：

1. 伊藤仁齋（1627-1705）

伊藤仁齋在解釋《論語·八佾》「子語魯大師樂」章時說：

當時音樂殘缺，伶官唯知論五音六律，而不知樂之節奏有自然之序，而其和在於絲毫之間，況於其通性情心術之微者乎？夫樂之於天下，猶柁之於船，或左或右，隨其所轉；將之於卒，或進或退，從其指麾。治亂盛衰，每與聲音相通，故夫子為大師一一指點而示之也。⁶

仁齋認為孔子之時，音樂之制度已隨政治之衰敗而殘缺不全。雖有伶官掌樂，然不知音樂節奏之序與樂理通人心、政治之微妙，所以孔子為大師解說其中奧妙。由此看見仁齋把聲、音、樂合起來看，且使之與個人之性情相通，更使之與天下之治亂相通。就此而言，仁齋與朱熹所見相同。仁齋曾評論〈關雎〉之樂：「〈關雎〉，成周之雅樂。其詩，言后妃之德；其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乃三百篇之首篇，而合于中和之德，使聽者自得性情之正，樂之最至美者也。」⁷仁齋分別就詩與聲說明〈關雎〉之樂，正因為「〈關雎〉之樂，能合於中和之德，而歸于性情之正」，因此「聞之者，邪穢蕩滌，查滓融化，自得

⁶ （日）伊藤仁齋：《論語古義》，收入（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鳳出版，1973年），卷3，頁44。

⁷ 同前註，卷3，頁124。

性情之正」，所以認定〈關雎〉是「樂之最至美者也」，⁸此為仁齋對〈關雎〉之樂之至極贊賞，故作出如此贊賞之形容。實則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解「成於樂」時，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⁹朱熹主要是針對廣泛之「樂」而論，仁齋則將之濃縮在〈關雎〉之樂。然而要問，仁齋可曾親聞〈關雎〉之樂乎？不然，何以知其聲如其所贊賞般之最至美？或亦知將有問者如是問，故轉而道：「然而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其本也，苟讀詩而善得其志，則聲音自在其中矣。」¹⁰仁齋此說，意在說明今日雖無法親聞〈關雎〉中和之聲，但透過誦讀最根本之詩，則可得詩人之志，詩人之志可得，則聲與音自然可得而知之。何則？蓋詩、志、聲相通故也。然而仁齋此說果真為問者而發？筆者以為不然，此實是仁齋對朱熹在《詩集傳·關雎》篇後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作的回應。朱熹說：

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¹¹

朱熹認為雖然吾人從詩中可見詩人與后妃性情之正，而獨遺憾未能聞其聲氣之和。只能退而求其次，要學者就詩詞達其義理，以涵養性情之正。仁齋對此作出回應，認為只要能做到「讀詩而善得其志」，不只性情之正可透過詩而得之，就連聲氣之和亦可得之。筆者以為此意味著仁齋暗批朱熹雖能讀詩，卻不善得

⁸ 以上三引文，同前註，卷3，頁41-42。

⁹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冊，頁133。

¹⁰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3，頁42。

¹¹ 宋·朱熹：《詩集傳》，收入朱傑人等校點：《朱子全書》，第1冊，卷1，頁403。

詩人之志，以致無法得其聲氣之和。

既然仁齋同意聲、詩相通，則面對鄭聲淫是否等同〈鄭詩〉淫之問題時，是否也持一貫之態度？仁齋在《論語古義》解「顏淵問為邦」章時，說：「鄭聲，鄭國之音。淫聲，能蕩人志。」解「子曰惡紫之奪朱」章時，說：「鄭聲，鄭國之音。雅樂，正樂也。」¹²兩則皆僅就志、聲、音、樂為言，而未直接涉及詩之問題。然「淫聲，能蕩人志」，若鄭聲淫，則鄭國之音能蕩人之志。依上所述，詩為志、聲、音之本，若鄭國之志、聲、音皆淫，則其根本之詩豈有不淫之理？就文獻而言，筆者未見仁齋論及鄭聲是否等同〈鄭詩〉，所以無以為據，然若聲、詩相通，則仁齋或許認同鄭聲即〈鄭詩〉之說。

2. 平元梅鄰（1660-1743）

仁齋之學生平元梅鄰認為：「舉凡風、雅、頌及古今詩歌、里巷童謠，無非風、賦、比、興之事，而以風為重。故風、賦、比、興、雅、頌皆可唱，稱為風雅之道。詩乃樂之歌物，合金、石、糸、竹、匏、土、革、木之八音，有於祭祀宗廟、燕享諸侯賓客、接待列國使臣之際奏樂者，亦可於《左傳》見列國大夫會合之時，各賦詩一章以言志之事。」¹³由此可見，梅鄰是遵從師說以為詩、歌、樂同體，尤其「詩乃樂之歌物」一句已可說明其意。

關於「鄭聲淫」，梅鄰說：「鄭聲者，今世不知其為何聲。醫書中所謂大病之人鄭聲之聲者，乃指言無根而哀聲。」¹⁴認為鄭聲去時久遠，今人已無從

¹² 二引文，見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3，頁234、264。

¹³ 「〈國風〉、〈雅〉、〈頌〉并に古今の詩歌里巷の童謠まで，風、賦、比、興あらずといふ事なし。中にも風を重んずる。故に風、賦、比、興、雅、頌とも唱へ，風雅の道と稱す。詩は樂のうたひ物也。金、石、糸、竹、匏、土、革、木の八音に合さし，宗廟の祭祀、諸侯賓客を燕享し、列國使臣のもてなしにも，樂を奏する事有り。列國の大夫の会合にも，各詩一章を賦して志をいふ事，《左傳》に見へたり。」見（日）平元梅鄰：《讀詩私說》（秋田：日本秋田縣大館市立圖書館藏，元文二年〔1737〕寫本），頁1b。（頁碼筆者自編，以下同）。感謝日本秋田縣大館市立圖書館及秋田縣立圖書館提供館藏本。

¹⁴ 「鄭聲，今の世にはいかやうの聲とも知へからず。醫書に大病の人の鄭聲の聲と言は根なくして，かなしき聲を言ふ。」同前註，頁8b。

得知究竟是何種聲音。然據醫書所謂「鄭聲之聲」，乃謂病危者語無根據，悲哀之聲。筆者非醫生，無可評斷梅鄰所提醫書之事。然據其意，可知醫者以「鄭聲」為病名，其狀為「語無根而聲哀」。經檢視東漢醫書《傷寒論》，確實有「鄭聲者，重語也」之說，且從其註可知，鄭聲、鄭音為不正。¹⁵又明《普濟方》也有「《傷寒》鄭聲為邪音也」、「《傷寒》鄭聲者，則其聲如鄭、衛之音之不正也」之說。¹⁶姑不論醫學如何，筆者以為梅鄰欲藉醫書之言以表「鄭聲」為大病將亡者之聲的意圖顯然可見。此是否意味著梅鄰欲將醫書之「鄭聲」與「鄭、衛之音，亡國之音」連結，而間接地解釋《論語》之「鄭聲淫」為不正之聲？不得而知。然就其以下正變之意見，卻似有此意。他說：「二〈南〉、〈豳風〉者，周之盛時，聖賢為教而作，其時亦載男女和樂而歌者，謂此為正〈風〉。周衰而各國之風各異也，其中亦有君子悲時憂民而作者，謂此為變〈風〉。」¹⁷可知他遵循漢、唐以來以二〈南〉、〈豳風〉為正〈風〉（即正詩），其他各國之詩為變〈風〉之說。亦即梅鄰視〈鄭詩〉為變〈風〉。又說：「雖說聖王之子孫，亦不能無不德之君。時世移，德衰亂世，亦勢之自然也，天也，非人為也。故變〈風〉、變〈雅〉亦載於聖經，使歷覽古今之廢興存亡，而知風俗

¹⁵ 《傷寒論注釋》註：「《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讖語，由邪氣盛，而神識昏也。鄭聲，由精氣奪，而聲不全也。讖語者，言語不次也。鄭聲者，鄭音不正也。《論語》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言鄭聲不正也。今新差氣虛人聲轉者，是所謂重語者也。若聲重，亦聲轉之。」見漢·張機撰，晉·王叔和編，金·成無己註：《傷寒論注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34冊，頁270。

¹⁶ 「《傷寒》鄭聲為邪音也。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是謂鄭聲為不正之音也。《傷寒》鄭聲者，則其聲如鄭衛之音之不正也。」見明·朱橚：《普濟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51冊，頁173。

¹⁷ 「二〈南〉、〈豳風〉は周の盛なりし時，聖賢教の為に作り，其時の男女和樂して歌ひたるをものせらる，是を正〈風〉と言ふ。周衰へて國國の〈風〉さまざま也，其内に君子時をかなしみ，民をうれへて作れるもあり，是を變〈風〉と言ふ。」見平元梅鄰：《讀詩私說》，頁1a。

變移，世態人情。若學者只見聞正事，而不見聞不正事，則不知人情事務，而不為所用。」¹⁸ 據此可知，梅鄰認為變〈風〉、變〈雅〉雖然載錄不正之事，卻不能不知。與上述之事合而觀之，則〈鄭詩〉之變〈風〉所錄為鄭國民間歌唱不正之事，是為不正之詩。轉〈詩·風〉為聲，則鄭聲豈不正是指不正之聲而言？梅鄰雖然沒有直接論證「鄭聲淫」就是「〈鄭詩〉淫」，但卻認為鄭聲為不正之聲、鄭之音樂為不正之音樂、〈鄭詩〉為不正之詩，由此可說明梅鄰確實持聲、詩、樂相通的立場。

（二）認為聲、樂與詩異者：

1. 伊藤東涯（1670-1736）

仁齋之子東涯則一反其父之說，以為「《詩》與樂不同」，他說：

《詩》與樂不同，《詩》乃指今之三百五篇《詩經》，皆可諷誦而歌。

《詩》中唯〈南〉、〈雅〉、〈頌〉用於音樂，而其餘皆不用於樂。又樂之中如〈韶〉、〈武〉，雖至春秋時代尚有所傳，然其詞已不見於《詩》中。六經有《詩》、《書》、《易》、《春秋》、《禮經》之外，又有《樂經》者。夫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合而觀之，則知《詩》與樂不同。¹⁹

東涯認為《詩》是指今日之《詩經》，樂是〈韶〉、〈武〉，故兩者不同，此其不同者一也；又說六經已含《詩》與樂，故知兩者不同，此其不同者二也；又據孔子「興於《詩》，成於樂」之言，可知兩者不同，此其不同者三也。東涯舉此三例證明《詩》與樂不同。其證辭言簡意賅，充分證明《詩》與樂確實不同。

¹⁸ 「夫聖王の御子孫といへども，不徳の君なき事あたはず。時世うつり徳衰へて亂世となるも勢ひの自然也、天也，人の為にあらず。故に變〈風〉、變〈雅〉も聖經にのせられて古今の廢興存亡を歴覽し，風俗のうつりかはる世態人情をしらしむ。學者正しき事のみを見聞て，不正事は見じ聞じとすれば人情事務をしらずして用をなさず。」同前註，頁 2b-3a。

¹⁹ 見（日）伊藤東涯：《讀詩要領》，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1978 年），卷 5，頁 17。

東涯所以要證明《詩》與樂不同，目的在推論鄭聲非〈鄭詩〉、鄭聲淫乃指聲音淫而非詩詞淫等事。東涯抄錄朱熹《論語集註》及《孟子集註》中兩處鄭聲之解，認為朱熹自己亦言鄭聲是鄭國之音、是淫樂，而非指詩詞為淫，所以東涯認為朱熹「此註最明白也」。²⁰他以朱熹之言反朱熹之論，可謂至當矣。然而如上所論，朱熹認為鄭聲淫即是〈鄭詩〉淫並非無所據，而是經過實際就〈衛詩〉三十九篇（〈邶〉、〈鄘〉）及〈鄭詩〉二十一篇分析所得之結果。²¹因此，東涯先就鄭聲非〈鄭詩〉反駁，說：「然所謂鄭聲，專就音聲上言，非就詞語之淫正言。所謂商聲、秦聲，皆為該國之音調。如吳歌、巴歛、越吟、郢曲之類，皆為各國之節。」²²亦即強調鄭聲是專就音聲上言，而非詞之淫正，一如商聲、秦聲、吳歌、巴歛、越吟、郢曲等皆為各國各地之音調、曲調，因此類推，鄭聲亦是鄭國之音調。東涯並舉孔子與《禮記》之言為證，說：「夫子亦未曰〈鄭詩〉而曰鄭聲。《禮記》亦言鄭、衛之音云云，其音比於慢。鄭聲專就聲上言一事，此等證據明矣。」²³此處，東涯指出孔子只言鄭聲未言〈鄭詩〉，以證鄭聲非〈鄭詩〉，又引《禮記》言「鄭、衛之音」「其音比於慢」等語，以證先人、古籍皆就音聲言鄭聲，非言〈鄭詩〉。因此，東涯認為：「鄭國之音聲淫蕩頹廢，人以為新奇而易溺，故云鄭聲淫。」²⁴接著又對「淫」字

²⁰ 同前註，頁 15。

²¹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從朱熹此論述中，亦可察知朱熹並無否定鄭聲是就聲、樂上言之說。只不過以《詩》考之，亦得〈鄭詩〉之詞多為男女淫奔之語之結果。朱熹由是轉聲為詩，認為孔子所言鄭聲，雖是指聲、樂言，但其詞則是指〈鄭詩〉。因此得出鄭聲淫，即是〈鄭詩〉淫之結論，所以朱熹於最後才會指出「《詩》可以觀，豈不信哉！」之嘆。見朱熹：《詩集傳》，頁 481。

²² 見伊藤東涯：《讀詩要領》，頁 15。

²³ 同前註，頁 16。

²⁴ 同前註，頁 15。

作出定義：淫非必皆言溺於色，其實是音聲偏於和樂之情況，一如水之溢出，一旦過於和樂，必流於淫。但是若以詩詞言之，則未必有此淫溢之現象產生。他以〈清廟〉、〈生民〉之正詩為例，反問主張淫詩者，如此正詩之詩詞即便有若干和樂之象，難道亦能一變而成淫詞乎？此是不可能之事。²⁵ 最後東涯引明代田汝成（1503-1557）〈放鄭聲〉，說：

玉陽田汝成著〈放鄭聲〉論，收於《史綱疑辨》。其略曰：「鄭聲，非〈鄭詩〉也。」「聲者，樂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故樂有五音，音有六律。六律之外，變為淫聲。於是乎有繁手雜弄，縈囀嫚引，依竊律呂，窮巧極妙，務以悅人者，惟鄭為最。故孔子曰：『吾惡似是而非者。』」其意亦明矣。²⁶

東涯認為田汝成所言最能說明聲就樂上說，聲為樂之主，故聲雅則樂正，聲淫則樂邪，非以詩詞為言。筆者檢視《史綱疑辨》，此書卷二有東涯所言田汝成之〈放鄭聲〉一篇，²⁷ 旨在說明鄭聲非〈鄭詩〉，認為鄭聲與雅樂雖皆為樂，但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孔子放之；承認〈鄭詩〉中，如〈東門〉、〈溱洧〉

²⁵ 同前註，頁 15-16。

²⁶ 同前註，頁 17。

²⁷ 〈放鄭聲〉原為田汝成所著《田叔禾小集》卷 10 中之一篇，《田叔禾小集》全十二卷，可參考清·丁丙（1832-1899）輯：《武林往哲遺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5 年），第 57-62 冊。後為林有望輯入《新刊晦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辯》傳至日本。東涯所言《史綱疑辨》見於明·林有望輯：《新刊晦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辯》，卷 2，頁 51，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子部第 96 冊，頁 425。根據大庭脩編著《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所載，可知此書（一部五本）於元祿十三年（1700）由商船運至日本。見（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年），頁 723。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有此書之寫本，係由廣瀨諒材於享保十二年（1727）據萬曆元年秋季既望金陵饒氏錦溪繡梓本抄寫而成。東涯曾校正過此書，《古義堂文庫目錄》書名標為《新刊末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辯》4 卷 5 冊，編號 134-27，見天理圖書館編：《古義堂文庫目錄》（奈良：天理大學出版部，1956 年），頁 305。

諸篇為淫亂之詩，但亦有「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故鄭聲是鄭聲，〈鄭詩〉是〈鄭詩〉，鄭聲非〈鄭詩〉。東涯引之以批判朱熹以聲為詩之誤，若止於論證聲與詩不同，則可。但若由此而欲證〈鄭詩〉非淫詩，則與田汝成之觀點相左。因為田汝成雖然批評朱熹將鄭聲視為〈鄭詩〉，但並非「〈鄭詩〉非淫詩」觀之持有者，而是承認〈鄭詩〉中某些詩篇確為淫詩。此點東涯異於田汝成，東涯卻無論及。但筆者以為其實單就「鄭聲」之字義言，任何人皆知「鄭聲」乃是就聲上說，東涯實無須大費周章地加以論證之必要。倒是「淫」字之解，以水過滿則溢，喻音聲過於和樂則淫，明白易懂。

2. 伊藤蘭嵎（1694-1778）

伊藤蘭嵎（為仁齋之五子、東涯之弟）卻不如此認為，他著《詩古言》提出另一種解讀：「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蓋謂鄭國聲歌淫哇，間歌以亂雅樂，當放去之而不歌也。故曰鄭聲，而不曰〈鄭詩〉，非言此經〈鄭詩〉也。程敏政有放鄭聲說可併觀矣。」²⁸ 蘭嵎認為孔子所言「放鄭聲」、「鄭聲淫」，意味鄭聲既非指鄭國之樂聲，亦非指《詩經》中之〈鄭詩〉，而是鄭國之聲歌，因其歌聲淫哇，恐亂雅樂，所以要放去而不歌。蘭嵎所指明代程敏政（1445-1499）之「放鄭聲」說，《史綱疑辨》卷二有題為「詩考 淫風非孔子定本」一文，為程敏政所撰，蘭嵎所指或為此篇。²⁹ 雖然蘭嵎認為程敏政此說可並存參考，實則程敏政之〈詩考〉，旨在論「古時《詩》雖有〈風〉、〈雅〉、〈頌〉之分，然皆是樂。詩之與樂，無二道。而詩是心之聲而發乎性情，故孔子於《詩》曰刪，刪則有放鄭聲之義，放其鄭聲以為萬世之常經。而有淫詩之今本《詩經》，乃出於漢儒之綴輯，而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然朱熹誤以為實出

²⁸ （日）伊藤蘭嵎：《詩古言・序說》（天理：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寬延三年〔1750〕自筆本），頁 8b。

²⁹ 〈詩考〉原收在程敏政著《篁墩文集》（全九十三卷拾遺一卷）卷 11 中之首篇，後為林有望輯入《新刊晦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辯》傳至日本。見明・林有望輯：《新刊晦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辯》，卷 2，頁 51，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6 冊，頁 420-421。

聖人之所刪，而批判〈小序〉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雖闢之為是，然視〈鄭詩〉多為淫詩，為矯枉過直。認為刺淫之詩乃孔子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刪者也。如此，則聖人刪《詩》、放鄭聲之意，始可明白於後世。」³⁰則可知程氏所謂孔子刪詩、放鄭聲之因，在詩與聲之間有其實質之關聯性：即詩是心之聲而發乎性情。簡言之，程氏認為「放鄭聲」與〈鄭詩〉淫有同質性，故為孔子所放、所刪。筆者以為蘭嵎既主張鄭聲非〈鄭詩〉，其謂「可併觀」意在使讀者觀後可證已說為是，若然，則蘭嵎正適得其反。

蘭嵎解讀「聲」為「歌聲」，認為鄭聲是鄭國之聲歌，不是〈鄭詩〉，也不是鄭樂。蘭嵎對朱熹解《論語集注》及《孟子集注》中兩處鄭聲，也深不以為然，他說：

田汝成非之，云：「鄭聲，非〈鄭詩〉也。」是說當矣。故每曰鄭聲而不曰〈鄭詩〉也。然朱子、田氏皆以為樂者，吾未能信之矣。亂，猶小不忍亂大謀。夫曰聲則非樂，蓋指歌聲也。所謂升歌〈清廟〉及間歌〈魚麗〉之類。歌者在室，以其聲淫以殺亂琴瑟笙鼓之雅樂爾，非鄭人制樂，廢夫琴瑟笙鼓，而別制淫聲之樂以亂雅樂也。³¹

蘭嵎認為田汝成批判朱熹之解為當，但亦只就「鄭聲，非〈鄭詩〉也」而言，其實蘭嵎並不認為田氏「聲者，樂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樂有五音，音有六律，六律之外，變為淫聲」之說為是，因此不能信服於「朱子、田氏皆以為樂者」之說。何則？蓋既言聲為詩者非，則言聲為樂者亦非矣。因此，蘭嵎主張：聲即指歌聲，既非詩，亦非樂。他更進一步說明所謂淫聲是歌聲淫哇，「恐其亂雅樂」是指此淫聲不適合於雅樂中歌唱，而不是指另制一種淫聲之樂，以亂雅樂。以上所論，乃為蘭嵎不同於其父、兄，有其獨特之處。蘭嵎於田氏之觀點，只取其鄭聲非〈鄭詩〉說，而批判其以聲為樂說，此舉不只針對田氏批判，

³⁰ 引文經筆者重整，見明·程敏政：《篁墩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2冊，頁185-187。

³¹ 伊藤蘭嵎：《詩古言·序說》，頁8b。

同時亦對自己家學提出修正。

對詩與樂之關係，則認為《詩》與樂有別，蘭嵎說：

（子）曰：「吾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詩》與樂蓋有別，故夫子慨嘆於〈韶〉、〈武〉之辨，翕、純、嘏、繹徒見其始終於語大師之言，對顏子問為邦，以樂則〈韶〉、〈武〉，放鄭聲；於《詩》曰：「小子！何莫學夫《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立與？」及「興於《詩》，成於樂」，此論《詩》與樂之有別，當知之焉。³²

蘭嵎解釋「吾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句時，先總言《詩》與樂不同，再舉孔子語大師與答顏淵為邦之問，以為孔子說樂之例；再舉「於《詩》曰」以為孔子說《詩》之例；最後提醒學者當知孔子亦區別樂與《詩》，此正足以論證《詩》與樂有別。蘭嵎此解雖短卻有力，但是並未真正解釋到孔子所言之內容。接著，蘭嵎對孔子所言「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之句，提出他的見解：

夫〈雅〉、〈頌〉，《詩》而非樂。然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夫子制樂，用之於魯之郊廟、朝廷者，夫子正之，而賓客宴饗皆出於正耶？豈思正其不正者耶？且得其當所奏者詩歌之，〈雅〉、〈頌〉二者得其當奏之所處之謂乎？恐皆不然也。從來解註混夫樂與〈雅〉、〈頌〉而以為一，故殆不可解也。竊謂：樂，喜好也，猶樂山、樂水之樂也。夫子言自衛反魯，魯人不知用。優游間暇，故心喜，校夫〈雅〉、〈頌〉，或相混淆失倫次者，撥亂反正，使二者各復得其當在之所也矣。³³

他還沒解釋之前，先三次提問「正」是何指，是一般所解之孔子正樂，因此於賓客宴饗之際，所奏之樂皆得以正之？抑或是孔子想以正樂以正〈雅〉、〈頌〉

³² 同前註，頁 8b-9a。

³³ 同前註，頁 9a-9b。

之不正？³⁴還是使〈雅〉、〈頌〉奏其所當奏之所？他認為都不是，因為前賢都解〈雅〉、〈頌〉即是樂，所以不可解。他認為〈雅〉、〈頌〉是《詩》而非樂。《詩》與樂不同，而前賢解釋此句之所以不可理解，正是將《詩》與樂混而為一之故。因為有此先入為主之觀念，所以解釋此句時，很容易陷入將此句中之「樂」解為音樂之「樂」，而出現各種不同之誤解。他認為若將此「樂」解為「喜好」之「樂」，將「正」之對象，由上面之「樂」轉向下面之「〈雅〉、〈頌〉」，³⁵則此句可得而解，即：「孔子自衛反魯後，樂於校正〈雅〉、〈頌〉，使之各得其所。」蘭嵎此解，可謂前無古人。

3. 奧田三角（1703-1783）

關於「鄭聲淫」，東涯之學生奧田三角在解釋〈將仲子〉時，說：「仲子，祭仲也。朱（子）以為男子之字，女子之詞，將《論語》之『鄭聲淫』誤為文詞之事，故捨〈小序〉，而視〈將仲子〉為淫奔之詩。措諸文詞者詩也，被諸管絃者聲也。」³⁶再如〈蕢兮〉，三角謂：「朱（熹）認為淫女呼男，輩行亦知子為叔伯，誘水有從也之意。廢〈小序〉之謬與誤聲為詩之忘（通妄）也。」³⁷

³⁴ 不知蘭嵎「正其不正」是否即為《義府》所言：「夫子入衛，而聞其聲，始知先王之樂，久為時俗之樂所亂。於是，歸魯得以正其不正，而〈雅〉、〈頌〉始復其故焉。得所者，復其舊之謂也。」但可知蘭嵎是就以樂正《詩》為言。見清·黃生：《義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8冊，卷上，頁28b-29a。

³⁵ 「正〈雅〉、〈頌〉」之語，其實並非蘭嵎所創，〈魏志〉有載魏文帝於黃初二年（221）正月之詔書中說：「昔仲尼資大聖之才……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此處所正之對象，正是蘭嵎所解。見晉·陳壽：〈魏志〉，《三國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4冊，頁55。

³⁶ 「仲子ハ祭仲也。朱ハ男子ノ字トシテ，女子ノ詞トス。《論語》ノ鄭聲ハ淫ト曰フ文詞ノコトト思ヒ誤リ，〈小序〉ヲ捨テ，淫奔ノ詩トス。文詞ニ措ハ詩也，管絃ニ被シムルハ聲也。」（日）奧田三角：《詩經國風詁解》（三重：三重神宮文庫藏，明和元年〔1764〕寫本），卷7，頁4。（頁碼筆者自編，以下同）。

³⁷ 「朱ハ淫女，男ヲ呼テ，輩行モ知子ハ叔伯トシ，誘フ水有ハ從也トノ意トス。〈小序〉ヲ廢スルノ謬ト，聲ヲ詩ト誤ヨリノ忘（メッタ）也。」同前註，卷7，頁30。

東涯純就聲上反駁朱熹之說；三角則從詞義上認為朱熹乃誤解《論語》「鄭聲淫」為〈鄭詩〉淫，直指朱熹誤聲為詩之魯莽妄為。指謫朱熹將鄭聲誤解〈鄭詩〉者，可見於明朱謀瑋《詩故》。朱謀瑋謂：「〈鄭詩〉二十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它亦多賢人君子之詞。而宋世之儒，誤釋『放鄭聲』一語，遂去〈小序〉，盡以淫奔目之。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詞是為詩，被諸管絃音律是為聲。鄭音好濫而淫志者，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諸詩乎？」³⁸ 根據上述，可知三角之說法來自朱謀瑋之《詩故》。

4. 伊藤東所（1730-1804）

東涯之子東所則說：

《詩》與樂異，《詩》乃三百篇，是也。樂乃〈韶〉、〈武〉、〈大夏〉，以金石之八音奏之，是也。就三百篇內，二〈南〉、〈豳〉，與〈雅〉、〈頌〉，則叶絲竹筦弦者，其餘十三國之詩，是為徒詩，惟有其詞，而不合奏樂。又有笙詩，有其樂而無其詞，〈白華〉以下六，是也。樂乃古有雅樂、鄭聲之別矣，猶後世之雅樂、俗樂之謂也。雅樂，正聲也。鄭聲，謂鄭國之音調，非鄭國之詩詞也。惟鄭國之音調淫哇，依竊律呂，窮巧極妙，能變亂雅音，故夫子惡之也，非以〈鄭〉、〈衛〉之詩為淫奔之詞也。子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乎。」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共謂音調節奏之正耳，非就詩詞上言之。玉陽田汝成有〈放鄭聲〉說，《辨疑錄》中詳之，今是不縷舉云。³⁹

此處可以看出，東所繼承其父之說，認為《詩》與樂不同。《詩》是指《詩經》三百篇；樂則為〈韶〉、〈武〉、〈大夏〉等，以八音奏之者。與東涯不同的是，東所指出《詩》有三種型態：一是有其詞，又可配樂者，如二〈南〉、〈豳〉、二〈雅〉、三〈頌〉等；一是有其詞，不配樂者，如十三〈國風〉（東

³⁸ 明·朱謀瑋：《詩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9冊，頁564。

³⁹ （日）伊藤東所：《詩解·釋例》（天理：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寬政十一年〔1799〕寫本），頁19a-20a。（頁碼筆者自編，以下同）。

所謂之十三國恐為筆誤，去二〈南〉與〈豳〉，實為十二國），此類型之詩，謂之徒詩；一是無其詞，有其樂者，如六笙詩。若依東所之分，則《詩》中無樂者，唯十二國徒詩，其餘皆有樂，此樂以金石之八音奏《詩經》之詩，則可謂《詩》與樂異乎？東所「徒詩」之說，顯然受南宋程大昌（1123-1195）《考古編》影響，《考古編》謂：「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者之本土。」⁴⁰不同者在程氏明白將〈豳〉列為徒詩，⁴¹而東所則將〈豳〉列為可入樂之詩。然而，程氏以〈豳〉詩為「徒詩」之說，本是個錯誤的論述。如《周禮》已有「獻（吹）豳詩」、「獻豳雅」、「獻豳頌」之說；司馬遷亦曰：「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則三百篇皆可入樂矣；而明代朱朝瑛、張次仲等又駁之，謂：「則季札觀樂於魯工之所歌，或稱其大，或譏其細，或美其泱泱，或美其颯颯，是豈獨以人聲論者，安得謂其不入樂也？」⁴²東所只認為〈豳〉詩可入樂，而其他十二國風仍然是徒詩，顯然東所在接受中國學者之說時，未能做全面性的考量。他又說：「樂乃〈韶〉、〈武〉、〈大夏〉。」則很明顯地指出，此處之樂，不同於演奏《詩經》之樂。蓋〈韶〉為舜樂，〈大夏〉為禹樂，〈武〉為周武之樂，就內容上言，當然不同於《詩經》之樂。又說：「樂乃古有雅樂、鄭聲之別矣，猶後世之雅樂、俗樂之謂也。」則東所確實將鄭聲視為樂，只不過是如後世之俗樂而已。鄭聲既為樂，謂為鄭國之音調亦不為過，皆就樂上言。

⁴⁰ 宋·程大昌：《考古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2冊，頁3。

⁴¹ 程說之誤，明代朱朝瑛（崇禎時進士）、張次仲（1589-1676）等已駁之。如「則季札觀樂於魯工之所歌或，稱其大，或譏其細，或美其泱泱，或美其颯颯，是豈獨以人聲論者，安得謂其不入樂也？」見明·朱朝瑛：《讀詩畧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冊，頁342。又見於明·張次仲：《待軒詩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冊，頁39。

⁴² 見明·朱朝瑛：《讀詩畧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冊，頁342。又見於明·張次仲：《待軒詩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冊，頁39。

唯此鄭聲、鄭國之音調淫哇，能變亂雅音，所以見放於孔子。簡言之，鄭聲是就鄭國之音調上言，非就鄭國之詩詞上言。又舉〈關雎〉為例以說明「洋洋乎盈耳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就音調節奏上言，非就詩詞上言之。以樂言鄭聲，其叔父已批判之，且東所自幼受蘭嵎之教，理應受其影響，但事實卻不然，何則？東所認為蘭嵎所著不依家學作解，廣博繁多，不可窮盡，因此常以其父東涯、祖仁齋之遺教，修身導人。⁴³就此點而言，東所不用叔父之說，其原委可知矣。

5. 仁井田好古（1770-1848）

自謂一生最欽佩仁齋、東涯之學，雖未得為其徒，而私淑諸人之仁井田好古說：⁴⁴

古之教，詩樂相終始，故曰：「興於《詩》，成於樂。」荀卿曰：「詩，中聲之所止也。」《史記》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其節奏舞蹈之數皆既缺，則觀聽其聲容，而養其耳目，和其心志，動蕩血脈，流通精神者，皆不可得矣，此為可憾而已。⁴⁵

好古引孔子「興於《詩》，成於樂」之說，認為《詩》與樂有其相終始之關係；引荀子之言以為詩之樂章，止於中和之聲，而不流於淫聲；引司馬遷之言認為孔子之時，《詩》皆可配以弦樂歌詠，以見《詩》與樂雖不同，卻有始末之關連。但如今《詩》雖存，而節奏舞蹈等樂理已缺失，而欲聽其歌聲，觀其舞容，

⁴³ 「季父蘭嵎，著《詩古言》，推時世，詳訓詁，亦不拘拘家庭之誨，別發揮一家之卓見，其說浩博不可涯涘矣。予生而多病弱質，及其長也，常以父祖之遺教，修身導人，不暇他事，何及經注？加之校刊父之遺書，殆三十有餘年矣。」伊藤東所：《詩解·釋例》，頁 22b-23a。

⁴⁴ 仁井田好古之生平及其著作可參考張文朝：〈域外漢學另一章：日本江戶經學家仁井田好古〉，《漢學研究通訊》第 34 卷第 1 期（2015 年 2 月），頁 28-37；及張文朝：〈仁井田好古的《詩經》觀及其對朱熹之批評〉。

⁴⁵ （日）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六德》（京都：紀州樂古堂，1834 年），首卷，頁 11b-12a。

以養耳目，以和心志，已是不可求得之事。更遑論如《史記·樂書》所言透過音樂得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之境界，⁴⁶ 如何能有之？好古以此為憾。就《詩》之音樂性而言，不唯好古引以為憾，恐是樂道不傳以後，所有學者所同感之事。

好古既同意「詩，中聲之所止」，則如何看待鄭聲與〈鄭詩〉之關係？他說：「夫子言鄭聲淫，未始言〈鄭詩〉淫。聲與詩豈可混為一哉？此考亭謬論之原本，諸儒從而和之，推波助瀾，種種議論，蠱生而不可遏，所謂毫釐千里，可不慎哉？鄭、衛不為淫詩，則〈小序〉之不可廢，不俟辨矣。」⁴⁷ 由此可見，好古將聲與詩劃分為二，認為聲與詩不同，不可混為一談，更何況孔子所言淫者乃指鄭聲，並非就〈鄭詩〉而言。⁴⁸ 批評朱熹將兩者等同，是其謬論之關鍵所在。

以上就詩與樂之關係，探究日本江戶時代古義學派學者之觀點，古義學派學者持樂、聲與詩同之意見者，大多同於《毛詩正義》所謂「志、言、詩、歌、音、樂」「皆始末之異名」，⁴⁹ 亦即詩、詞、歌、聲、音、樂，雖各自位於始末不同階段而有不同之名稱，實為一體。而持樂、聲與詩異之意見者，除蘭嵎主張聲者非詩、非樂外，大多承認聲是就音、樂言，且將詩與樂置於六經之範疇下論之，自然得到《詩》與樂異之結果。筆者以為古義學派學者之所以要區別《詩》與聲，使之詩是詩，聲是聲，正是為〈鄭詩〉非鄭聲作辯護。所以如不先做好《詩》與聲之區別，則無法看出古義學派學者批判朱熹「鄭聲淫所以〈鄭詩〉亦淫」的誤論。反之，一旦區別清楚，不僅可以看出誰主張鄭聲淫，

⁴⁶ 漢·司馬遷：《史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3冊，頁569。

⁴⁷ 《毛詩補傳·毛學》，首卷，頁23 a-23 b。

⁴⁸ 江口尚純認為：好古指出朱子之淫奔詩說實因誤音與詩辭混同而發。參考江口尚純：〈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序說〉，頁52。

⁴⁹ 「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調之為樂，皆始末之異名。」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朱傑人等整理：《毛詩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上冊，頁8。

誰主張〈鄭詩〉淫，從而亦可得知該學者有無持淫詩觀。以下，將探討古義學派學者對淫詩之觀點。

三、古義學派學者之淫詩觀

如上所述，朱熹認為《詩經》中有二十餘首淫奔者自作之淫詩，則古義學派學者如何看待朱熹之淫詩說？本節分有無兩部分論述：（一）認為有淫詩者，有仁齋與東所二人。（二）認為無淫詩者，有東涯、三角、好古三人。梅鄰與蘭嶠因為沒有明確論及淫詩，所以不在本節討論範圍內。

（一）認為有淫詩者

1. 伊藤仁齋

首先就仁齋來看，如前所述，仁齋認同聲詩相通，同意孔子所言「鄭聲淫」，則理應亦同意有淫詩存於《詩經》之中。他在《語孟字義》說：「〈棠棣〉之詩，淫奔之辭也。夫子取之，以明道之甚邇。」⁵⁰此話意在說明詩之所見因人而異，如〈棠棣〉之詩，有人以為淫奔之辭，而夫子以之明道甚近。然而令人在意者，一般以〈棠棣〉為〈小雅〉之〈常棣〉，乃宴請兄弟之詩，先不管何以仁齋有「淫奔之辭也」之言？然既有此言，則可知仁齋承認《詩》中有淫詩。但是他並不認為朱熹所謂「淫詩皆淫奔者自作」為正確之論，仁齋說：

詩有美刺，蓋詩之作，有有作者者，有無作者者。大抵當時不知誰人所作，或作詩以諷人之淫，或本無此事，而託詞以見其情，朝野流傳，以相詠歌耳，非專有意美某人、刺某人也。後之錄詩者，或國史，或採詩官，撮其大意，為某詩美某人，某詩刺某人，今之〈小序〉是也。而朱子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以著其義。然後之諸儒多言〈小序〉不

⁵⁰ 伊藤仁齋：《語孟字義》，收入（日）井上哲次郎等編：《日本倫理彙編》（京都：臨川書店，1970年），卷5，頁56。

可廢焉，其說皆有明據。愚又謂：若廢〈小序〉，而悉據經文，則事多有害于義者。……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雖淫奔者，不可自發其奸，其不相通也如此。故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則〈國風〉諸篇，類皆為淫奔者之所自作，而美刺之旨不明矣。故曰：事多有害於義者，正為此也。⁵¹

他從詩有美刺切入，論述《詩》中所以有淫詩，乃詩人為「諷人之淫」而作，後之錄詩者取其大意而以為刺，此為〈小序〉美刺之由來。更何況就常理而言，人皆有羞惡之心，很難想像淫奔者自發其奸。日本學者清水徹認為仁齋在此找到「即使淫奔者亦有其道理」的理由，而排除淫奔之詩。⁵² 因此，仁齋認為淫詩非淫奔者自作，批評朱熹之主張造成美刺之旨不明之後果。

就淫詩說而言，筆者不曾發現仁齋明白指出其說來自何處。但關於仁齋之《詩經》觀論述，東涯則曾在《經學文衡》卷二的識語中，為其父發聲，謂：「先子嘗併書丘氏說及鍾氏〈詩論〉，末附自著〈詩論〉為一冊。」⁵³ 此說明仁齋〈詩論〉中之觀點，受明代丘濬（1421-1495）與鍾惺（1574-1624）影響，而同於鍾惺之說，特別是「詩，活物也。」正是鍾惺詩說核心論點之一。⁵⁴ 徂徠亦嘗指出仁齋〈詩說〉中之意見「其實丘瓊山之意」。⁵⁵ 可見仁齋《詩經》觀亦有同於丘濬者，則仁齋之學，其來有自矣。

2. 伊藤東所

東所著有《詩解》十八卷，有較完整之論述。《詩解》對淫詩有何見解？

⁵¹ 同前註，頁 57-58。

⁵² 參考清水徹：〈伊藤仁齋的《詩經》觀〉，頁 17。

⁵³ 伊藤東涯輯：《鼎鐫經學文衡》（京都：平安書坊奎文館，1734 年），卷 2，頁 6b。

⁵⁴ 關於仁齋「詩，活物也。」之根源，可參考張文朝：〈《論語古義》中所見伊藤仁齋之《詩經》觀〉，《清華中文學報》第 15 期（2016 年 6 月），頁 16-19。

⁵⁵ 見（日）荻生徂徠：《護國隨筆》卷 4 第 3 條，收入（日）西田太一郎編：《荻生徂徠全集》（東京：みすず書房，1976 年），卷 17，頁 138。

以下舉朱熹所提二十三首淫詩為例，⁵⁶ 探究東所之見，經分析得知東所認為 1. 是淫奔之詩者有〈靜女〉、〈木瓜〉、〈大車〉、〈蘄兮〉、〈褰裳〉、〈東門之墀〉、〈溱洧〉、〈東門之楊〉等八篇，此皆反〈序〉說，而依從朱熹所謂男女相期、相贈、相悅之詩，或女惑男之詩者為淫詩，此亦為東所判定淫詩之準則所在。認為 2. 是刺詩者有〈桑中〉、〈將仲子〉、〈山有扶蘇〉、〈狡童〉、〈丰〉、〈子衿〉、〈東門之池〉等七篇，此皆從〈序〉而反朱，其中〈桑中〉所刺對象與〈序〉說不同，〈序〉以為刺衛國之淫風，東所則認為乃刺公子頑之淫於宣姜。⁵⁷ 認為 3. 非淫詩亦非刺詩者有〈有狐〉、〈采葛〉、〈丘中有麻〉、〈遵大路〉、〈有女同車〉、〈風雨〉、〈揚之水〉、〈東方之日〉等八篇，其中有從〈序〉反朱者，如〈采葛〉從〈序〉「懼讒」，反朱「淫奔」；⁵⁸ 〈風雨〉從〈序〉「思君子」，反朱「淫奔」。⁵⁹ 江口尚純也認為東所對〈小序〉的「美刺說」多持批判的態度，而對〈鄭風〉的〈序〉說，則雖大多依從朱熹淫詩說，但如〈將仲子〉、〈風雨〉、〈子衿〉則是遵從〈序〉說。⁶⁰ 但因為江口尚純的論文不是專論淫詩問題，所以僅提出二、三篇以為說。又有反〈序〉從朱者，如〈有狐〉反〈序〉「刺時」，從朱「謂男女失時為未安」；⁶¹ 〈有女同車〉反〈序〉「刺忽」，從朱「牽強附會之說」。⁶² 其餘四篇皆為東所自說，亦即既反〈序〉又反朱者，如東所認為〈丘中有麻〉乃敘述雖小邑而有能治之人，人民賦其事而相喜之詩，既認為〈序〉之「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與其異義，且批評朱《傳》以為淫奔之詩沒有根據。⁶³ 認為〈遵

⁵⁶ 根據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頁 84，及黃忠慎：〈朱熹「淫詩說」衡論〉，《靜宜中文學報》第 6 期（2014 年 12 月），頁 5-6。

⁵⁷ 伊藤東所：《詩解·鄘風》，卷 3，頁 8a。

⁵⁸ 伊藤東所：《詩解·王風》，卷 4，頁 12a。

⁵⁹ 伊藤東所：《詩解·鄭風》，卷 4，頁 36b。

⁶⁰ 江口尚純：〈伊藤東所《詩解》考略〉，頁 7。

⁶¹ 伊藤東所：《詩解·衛風》，卷 3，頁 36b。

⁶² 伊藤東所：《詩解·鄭風》，卷 4，頁 29a-29b。

⁶³ 伊藤東所：《詩解·王風》，卷 4，頁 15a。

大路〉乃去婦臨別述情之詩，不以〈序〉說「思君子」為然，批評朱《傳》以為淫奔者之辭亦失矣。⁶⁴認為〈揚之水〉乃兄弟或夫婦處衰世，相對而述懷之詩，批評〈序〉閔忽無臣，終以死亡，於詩無所見，⁶⁵東所雖無明言反朱之詞，但既以「兄弟或夫婦」為說，則反朱熹謂「此男女要結之詞」、「淫者相謂」之詞，⁶⁶其意甚明。認為〈東方之日〉乃齊侯之臣，夫妻情愛，常相和相共之詞，而非〈序〉所謂之刺詩，朱熹雖亦反〈序〉刺詩之說，但以為男女淫奔者所自作，東所雖無直言批判，但以「夫妻情愛」為說，則批判之意已明。⁶⁷

除以上所述二十三篇詩之外，東所認為〈國風〉中仍有淫詩者，即：〈野有死麕〉、〈野有蔓草〉、〈防有鵲巢〉、〈月出〉等四篇。如〈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朱熹《詩序辨說》謂：「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⁶⁸東所則認為：「此詩男女相贈答之詞。凡人之求妻，贈物通情，女亦非不從，唯欲有禮耳。人情之所有，不忘禮義也。〈序〉云：『惡無禮也。』所見乃異。」⁶⁹此詩朱熹於《詩序辨說》以為「此〈序〉得之」，但對於「無禮」的內容有意見，此〈序〉之本文並無提及「無禮」者指何內容，但有「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句，似可認為〈序〉乃指「淫亂之非禮」，因此朱熹認為「此〈序〉得之」。而朱熹所否定之「無聘幣之禮」，乃鄭《箋》之詞。⁷⁰亦即朱熹認為所謂「無禮」乃指「淫亂之非禮」，而非指「無聘幣之禮」。因此又於《詩集傳·野有死麕》卒章謂：「此

⁶⁴ 伊藤東所：《詩解·鄭風》，卷4，頁26a。

⁶⁵ 同前註，卷4，頁38b-39a。

⁶⁶ 前者見朱熹：《詩序辨說》，頁372，後者見朱熹：《詩集傳》，頁478。

⁶⁷ 伊藤東所：《詩解·齊風》，卷5，頁5b-6a。

⁶⁸ 朱熹：《詩序辨說》，頁360。

⁶⁹ 伊藤東所：《詩解·召南》，卷1，頁34b。

⁷⁰ 「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見《毛詩注疏》，卷1，頁132。

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東所則不認為〈序〉說為是，同時也否定朱熹「此〈序〉得之」之言，認為非謂「惡無禮」，其實乃「不忘禮義」。又非朱熹所謂「女子拒之之辭」，而是「女亦非不從」。但歸根究柢，皆在一「禮」字，〈序〉與朱熹重在言女子拒男之淫亂非禮，東所則同意鄭《箋》之詞，側重「媒妁鴈幣」之禮，而非僅是男女私下「贈物通情」而已。又如：〈野有蔓草〉，〈序〉謂：「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詩序辨說》引呂祖謙之言，謂：「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廼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⁷¹可知朱熹意在批評〈序〉說有望文生義之嫌，而非直指為淫詩。但《詩集傳》卻以為：「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此詩若依詩文解之，則實為男女相遇而合於野田草露之間，朱熹又謂「故賦其所在以起興」⁷²，則知為淫奔者之自作。因此，東所謂：「此詩男女不期而會，相悅懌而作也。」可知東所將之視為淫詩，而批評〈序〉之視為「刺時」為「迂哉」，⁷³亦即東所認為若以此為刺時之詩，則離詩旨更遠，而不可從。再如：〈防有鵲巢〉，〈序〉謂：「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詩序辨說》謂「此非刺其君之詩」，《詩集傳》則謂「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⁷⁴可知此詩為擔憂讒人離間所私之人之詩，故朱熹未視為淫詩。東所則謂：「此詩男女相私，為人見張誑，述其愁也。必有所指，今不可考也。」既言男女相私，又自述其愁，則東所將之視為淫詩可知矣。唯對〈序〉說有疑慮，故說：「不知其然否乎」。⁷⁵而〈月出〉，〈序〉謂：「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朱熹認為：「此不得為刺詩」，而是「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⁷⁶既是「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詩中又有

⁷¹ 朱熹：《詩序辨說》，頁 373。

⁷² 朱熹：《詩集傳》，頁 480。

⁷³ 以上二引文，見伊藤東所：《詩解・鄭風》，卷 4，頁 41a。

⁷⁴ 朱熹：《詩序辨說》，頁 379；朱熹：《詩集傳》，頁 519。

⁷⁵ 以上二引文，見伊藤東所：《詩解・陳風》，卷 6，頁 26a。

⁷⁶ 朱熹：《詩序辨說》，頁 379；朱熹：《詩集傳》，頁 520。

思念者之「勞心悄兮」、「勞心慄兮」、「勞心慘兮」，可知是自作之詩，符合朱熹淫詩之規定。因此，東所認為此「男女相會，相悅之詩也」。可知是淫詩矣。又批評〈序〉說為「不知其所本也」。⁷⁷

總而言之，東所承認《詩》中有淫詩之存在，〈國風〉中有十二篇男女淫奔之詩，繼承東涯「鄭、衛淫奔之詩，方是〈風〉詩之眼目」之說（見下文）。江口尚純指出東所認為人情多樣，但若站在「可以觀」的立場而言，則鄭、衛淫奔之詩，才是風詩的關鍵所在。⁷⁸可知東所雖然接受朱熹淫詩說，但並非無條件遵循，甚或有所批判。江口尚純也認為東所不盲從於《詩序》說、朱子說，而根據自己的解釋，慎重地論斷，可以說正是東所的態度。⁷⁹筆者也贊同此說。

（二）認為無淫詩者

1. 伊藤東涯

東涯認為鄭、衛之詩，似乎無須如朱熹般斥為「淫奔」之地步，他指出：「鄭、衛之詩只是男女相誘之詞，民間常有之事，並無足以深戒之惡，更不到逆弑父君、殺夫奪妻之不仁不義，又周幽厲、齊襄公、衛宣公等惡逆淫行之詩，是當時有識之士諷刺之作，而非此等惡人所自作。」⁸⁰可知東涯主在批評朱熹謂淫詩皆淫奔者自作之主張，且反駁朱熹所謂淫詩，實則亦非淫詩，而是刺詩。

然而，東涯一面否定朱熹視鄭、衛為淫奔之詩，同時認同明代王陽明等「後儒將聖人所刪而不取之鄭、衛淫奔之詩，以補秦火亡缺之數，此等淫奔之詩如何薦鬼神、宗廟？」之主張。一面卻說：「然《詩》道人情為古今之通論也。」

⁷⁷ 以上二引文，見伊藤東所：《詩解·陳風》，卷6，頁27a。

⁷⁸ 江口尚純：〈伊藤東所之詩經學〉，頁3。

⁷⁹ 參考江口尚純：〈伊藤東所《詩解》考略〉，頁7。同時，江口尚純也注意到東所繼承其父東涯「鄭、衛淫奔之詩，方是風詩之眼目」之說，強調東所重「室家」之情，而與以教誨為主的《論語》等書做出嚴峻區別。參考江口尚純：〈伊藤東所之詩經學〉，頁3。

⁸⁰ 見伊藤東涯：《讀詩要領》，頁11。

情有各種各樣，因以室家之情為重，故謂之情欲、情竇等。然則，鄭、衛淫奔之詩之載，是《詩經》之眼目。所謂可以觀者，不亦在此乎？」⁸¹東涯認為《詩》道人情，人情中又以室家之情為重，因此《詩經》中載有鄭、衛淫奔之詩，自然成為《詩經》之「眼目（重要關鍵）」，可藉以觀風俗人情，所謂《詩》可以觀，正是指此。即東涯贊同鄭、衛之詩為淫詩，且有其觀風之功能。如此，東涯為批判朱熹淫詩說，而不承認鄭、衛之詩為淫詩；但為強調《詩》道人情，承認鄭、衛淫詩之載於《詩經》有其觀風之功能。可見東涯於鄭、衛之詩是否為淫詩之問題上，有其矛盾之處。就淫詩之作者與刺詩觀而言，可以說東涯完全繼承了仁齋之觀點。

2. 奧田三角

東涯之學生三角則根據仁齋在解釋〈八份〉篇「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時所言：「今觀〈小序〉之作，其首句文辭古奧，實出於古人之手，其為國史之作明矣。其下云云者，猥瑣鄙俚，不足觀之，且自相矛盾，不可據以為信。故今據〈小序〉首句為斷。」⁸²而於所著《詩經國風詁解》中抄錄〈小序〉首句，施以訓讀。其後空一格，首句以下則以日文解說，然內容與〈小序〉不盡相同。由此體例可知三角遵從仁齋之說，以首句為斷。然其不同處，在仁齋認為首句以下「不可據以為信」，而三角則挑選〈小序〉合於詩意、史實之文，施以簡明之解釋。在中國《詩經》學史上提出唯取〈小序〉首句者，當屬唐成伯璵《毛詩指說》，北宋蘇轍（1039-1112）《詩集傳》繼之，於〈小序〉唯取首句。⁸³則仁齋之說，亦有所徵矣。

從三角對〈小序〉的處理方式可知其對淫詩說之立場，亦即三角遵從〈序〉說，不以為《詩經》中有淫詩之存在，只承認有刺淫之詩。因此，對朱熹所提

⁸¹ 以上二引言，同前註，頁 11。

⁸²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卷之 2，〈八份〉第三，「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頁 42。

⁸³ 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 冊，頁 326-327。

淫詩之篇章，亦多採批判之態度。如在〈桑中〉謂：「朱（熹）附會〈樂記〉桑間濮上之音。然云〈桑中〉，而不云〈桑間〉。淇上也，非濮上。廢〈小序〉，據經文，事多害義，專此等章之事也。托刺奔云也，若為淫奔者之作，則有一人約三人乎，或各有斯（應為期之誤）約乎之疑。」⁸⁴ 另外，在〈丘中有麻〉亦可見同樣之批評，三角謂：「朱（熹）以婦人望其所私之人不來，以施施為喜悅，故疑丘中另有留女，因而視為淫奔之詩。捨〈小序〉之誤也。有約子國、子嗟二人乎，或各有約對乎之疑。」⁸⁵ 如此二例，可知三角批判朱熹註詩不用〈小序〉，只據經文，則終將導致誤解經文的不良後果。三角之批評，實亦繼承自仁齋、東涯父子之說。又，解〈大車〉「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朱《傳》有『庶幾死得合葬』，則為女對男之約誓也，主合葬也。詩人之意則主異室也。」⁸⁶ 此則註解雖短，卻可見三角對朱熹之解之不以為然。朱熹據經文解為：女方知其於現實上今生無法與所愛之人相奔而同居一室，期望至少死後能與之同穴。若如三角所解，則詩人意主生時不能同室，何苦之甚，則朱熹之解似較三角為佳。如上所述，三角繼承仁齋與東涯之說，以廢〈小序〉之謬及詩人之意批判朱熹淫詩說。

3. 仁井田好古

以上述二十三篇淫詩，檢視好古之淫詩觀，將會有何結果？以下即針對《毛詩補傳》中之論述，分析好古對淫詩之看法。好古在〈溱洧〉「論」中引《前漢書·地理志》說：「鄭地右澨左沛，食溱洧焉，土陋而險，山居谷汲，

⁸⁴ 「朱ハ〈樂記〉桑間濮上ノ音ヲ附會ス。然レドモ〈桑中〉ト云テ，〈桑間〉ト云ハズ。淇上也，濮上ニ非ズ。〈小序〉ヲ廢シテ，經文ニ據ハ，事多害義，專ラ此等ノ章ノ事也。刺奔托シテ云也。淫奔者ノ作トスレバ，一人三人ニ約スルカ，各斯約アルカノ疑アリ。」 奧田三角：《詩經國風詁解》，卷4，頁13。

⁸⁵ 「朱ハ婦人其私スル人ノ不來ヲ望トシ，施施ヲ喜悅トシ，丘中ニ外ニ留ル女アルト疑トシテ，淫奔ノ詩トス。〈小序〉ヲ捨ラルルノ誤也。子國、子嗟ノ二人ニ約センヤ，又各約スル對（あいて）アリヤノ疑アリ。」 同前註，卷6，頁19。

⁸⁶ 「朱《傳》ニ庶幾ハ死得合葬トアレバ女ノ男ニ約誓スル也。合葬ガ主ニナル也。詩人ノ意ハ異室ガ主也。」 同前註，卷6，頁18。

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此與朱熹相同，乃就地理方面說明致使鄭國俗淫之原因，然而好古卻以此抵制朱熹鄭聲即〈鄭詩〉之觀點，因此又引明楊慎之言，謂：「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⁸⁷則好古批判朱熹為誤之意甚明。亦即朱熹以鄭國地理環境為造成鄭國詩淫之原因之一，而好古則不認為鄭國風俗與鄭國詩詞之間有任何關連性。因此，批判朱熹淫詩觀為非。江口尚純則指出：好古在〈溱洧〉篇末引清陳啟源「鄭聲淫是聲淫而非詩淫」之論認同其說，⁸⁸筆者以為此亦是好古反對朱熹鄭聲即〈鄭詩〉的另一明證。又如好古在《毛詩補傳》〈靜女〉中引明郝敬：「朱子改為淫奔之詩，意索然矣。」又引陳啟源：「橫渠、東萊皆从〈叙〉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為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⁸⁹〈桑中〉引郝敬：「朱子改為淫者自作，非也。」⁹⁰〈木瓜〉引明何楷：「〈序〉意甚明，朱子改為男女相贈答之辭，無稽甚矣。」又引郝敬：「此詩事辭甚明，朱子改為男女贈答之辭，此愚所謂好成古人之惡者也。儻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乎？」⁹¹〈丘中有麻〉引陳啟源：「朱子指為淫詩，果何據乎？」⁹²〈將仲子〉引何楷：「此詩為祭仲諫大叔事而作，語意昭然無可疑者。朱子先有成見，胷中主定鄭、衛皆淫詩，一聞蒲田鄭樵氏謂此淫奔者之辭，便欣然引為同調，令人懣極。」⁹³〈遵大路〉引陳啟源：「朱《傳》以此詩為淫詩，引宋玉〈登徒賦〉為證，諸如此之類，其用意可謂勤矣。間嘗考六經之文，互相沿襲者多，有語雖同，意未必盡同也。況後世騷人、墨士擷取經文，不過攬其芳華以資潤色，豈暇尋其本旨哉？」⁹⁴〈有

⁸⁷ 以上二引文，見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卷7，頁33a-33b。

⁸⁸ 江口尚純：〈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序說〉，頁52。

⁸⁹ 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卷3，頁42b。

⁹⁰ 同前註，卷4，頁11b。

⁹¹ 同前註，卷5，頁24b-25a。

⁹² 同前註，卷6，頁19b。

⁹³ 同前註，卷7，頁6a。

⁹⁴ 同前註，卷7，頁13b。

女同車〉引何楷：「朱子疑謂亦淫奔之詩，則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宣子于郊，子旗賦〈有女同車〉而宣子皆稱善，豈有淫奔之詞，而可登之燕享者乎？」⁹⁵〈山有扶蘇〉引何楷：「朱子以為淫女戲其所私者，淺陋甚矣。」〈薤兮〉引何楷：「不知朱子何意，必欲為淫女之詞。夫女雖善淫，不應呼叔兮，又呼伯兮，殆非人理，言之污人齒頰矣。又按：鄭六卿餞晉韓宣子，各賦〈鄭詩〉，子柳賦〈薤兮〉，宣子皆稱善，則其非淫詩可知。」〈狡童〉引何楷：「朱子謂此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不審聖人刪《詩》，將以垂世教，顧留此等詩何為？」⁹⁶〈丰〉引何楷：「朱子改為婦人與男子失期，既乃悔之而作，則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乃具禮服，以待車馬者乎？且堂上非所私之地，既稱伯，又稱叔，何所私之眾哉？」⁹⁷〈風雨〉引何楷：「朱子云〈序〉意甚美，以詞氣輕佻，斷作淫詩。今按此詩詞氣亦未見有輕佻處，且其云風雨晦冥，乃淫奔之時。然耶？否耶？」又引明韋調鼎：「若此詩辭，絕無一字狎褻，而朱子誣以為淫奔，抑何僻也？」⁹⁸〈揚之水〉引何楷：「此詩朱子改為淫者相調之辭，……況〈國風〉〈揚之水〉三見，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一〈唐風〉，比晉昭。此詩言忽，其事同，故其比同，參伍求之，則詩意粲然明白，無容復二三其說矣。」⁹⁹〈溱洧〉引明王道（生卒年不詳）：「鄭國二十一篇，或語意明白，難以誣說。或〈序〉說、古注皆有事證。而朱子一切翻倒，以淫奔目之，而蔽以放鄭聲之一語。若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佚狎蕩之尤者，聖人欲垂訓萬世，何取于此，而乃錄之以為經也邪？」又引陳啟源：「朱子《辨說》謂孔子鄭聲淫一語，可斷盡〈鄭風〉二十一篇，此誤矣。……朱子以鄭聲為〈鄭風〉，以淫過之淫，為男女淫欲之淫，遂舉〈鄭風〉二十一篇，盡目為淫奔者所作。後學沈於其說，竟不知作詩者本來面目矣。夫孔子刪《詩》以垂世立訓，

⁹⁵ 同前註，卷7，頁17a-17b。

⁹⁶ 以上三引文，同前註，卷7，頁19b-21a。

⁹⁷ 同前註，卷7，頁23a。

⁹⁸ 以上二引文，同前註，卷7，頁25a-25b。

⁹⁹ 同前註，卷7，頁28a。

何反廣收淫詞艷語，傳示來學乎？」¹⁰⁰如此，好古在以上所舉十四篇詩之「論」中引明、清學者五人，共十八人次，以論朱熹淫詩說之非。

在好古看來，朱熹所謂之淫詩都是刺淫之詩。如好古在〈桑中〉「論」，引何楷：「是詩乃國人代為淫奔者之語以志刺」，而非淫詩。因此，好古謂：「此詩雖代為淫者之語，與淫者自作詞意自別。其云孟姜、云孟弋、云孟庸，舉國中之貴族，以見其餘，非出於刺者之口而何？若使淫者自作，安有歷舉貴族，以見其餘哉？毛《傳》曰『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其義確矣。朱子不信〈序〉說，為淫者自作，不問其詞意也。」¹⁰¹在〈東門之墀〉首章「翼」，好古認為：「此詩直陳淫奔者之辭以刺時，與〈桑中〉、〈溱洧〉一般。〈序〉曰『刺亂也』，男女奔誘，不顧禮義，風俗壞亂莫甚焉，其曰『刺亂』，固宜。」在〈子衿〉「論」引韋調鼎：「如此詩，誰不識為刺學校廢，而朱子故誣為淫奔，所謂偏執之私心也。」¹⁰²在〈溱洧〉「論」引何楷：「朱子據薛君注，以解此詩，是矣。然謂淫奔者自敘之詞，則亦未然。觀篇中具敘事體，乃直是作詩者，暴其事以刺爾。」又引王安石：「民之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¹⁰³在〈東方之日〉首章「補」引鄭玄：「即，就也。」王肅曰：「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古昏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也。」在「論」中好古認為：「舉日月以喻明盛，其義正大。『彼姝者子』，美男子之辭，〈鄘風〉以之稱大夫，足相徵也。履之為禮，本古訓也，毛義鑿鑿明甚，諸家強為淫奔之詩者，何也？」¹⁰⁴在〈東門之池〉首章「補」好古認為：「東門之池，而後可以供漚麻之用，以喻貞賢之善女，而後可以輔君德。陳侯荒淫，所幸非德選，故詩人思內助也。」在「論」中引郝敬：「是詩朱子改為男女會遇之辭，非也。詩人惡淫女思淑姬，猶〈小雅·車輦〉之思季女也。君德不淑，而致望

¹⁰⁰ 以上二引文，同前註，卷 7，頁 33b-34a。

¹⁰¹ 以上二引文，同前註，卷 4，頁 11b-12a。

¹⁰² 以上二引文，同前註，卷 7，頁 23b-24a、頁 27a。

¹⁰³ 以上二引文，同前註，卷 7，頁 33a-33b。

¹⁰⁴ 以上二引文，同前註，卷 8，頁 6b-7a。

于內助，無俚之至，所以為刺也。」¹⁰⁵ 在〈東門之楊〉「論」中引郝敬：「此詩與鄭之〈丰〉事類，而其刺同。朱子改為男女期會，負約之辭，暮夜郊外，林莽相期，唯恐人知，又自詩以傳乎？非情也。」又引陳啟源：「『昏以為期』，親迎之候也，詩有明證，何云私約哉？」¹⁰⁶ 好古在以上所舉七篇詩中引漢、宋、明、清學者六人，共八人次，及自己之觀點，以駁被朱熹視為淫詩者實為刺淫之詩。另外，〈序〉以為〈有狐〉為「刺時」，〈大車〉為「刺大夫」，〈采芣〉為「懼讒」，〈褰裳〉為「思見正」，故皆非淫詩，好古無異論。凡此在在說明好古對朱熹淫詩說採取批判之態度。

由上述之分析可看出，好古較少直接出自己論述淫詩問題，多在「論」中引中國明、清學者，如明郝敬（仲輿）、何楷（玄子）、韋調鼎（玉鉉）、清陳啟源（長發）等批評朱熹淫詩說之言以表己意。他認為：「凡淫聲感人，猶佞人使人迷惑不自知，故聖人深惡之。如淫奔之詩，善惡邪正，孰得而惑之哉？音與詩混合為一，朱說之謬，實在於此，諸儒辨駁允當。」¹⁰⁷ 雖然江口尚純認為此處旨在說明好古指出朱熹淫詩說之謬，原因在音與詩混。¹⁰⁸ 但筆者以為也可以用來說明雖然好古多借用他人之文句，實則心中早有定見，可視為好古對淫詩說之觀點，一句「諸儒辨駁允當」，足以代表好古之心聲。亦即：好古完全相信〈序〉說，只承認有刺淫之詩，而無朱熹所謂淫奔者自作之淫詩。¹⁰⁹

如上所述，可知古義學派學者引用中國學者最多者非好古莫屬，所著《毛詩補義》引中國學者二百二十四人，其中明代六十五人、清代八人。如上所舉，其中與淫詩說相關之明人有王道、郝敬、何楷、韋調鼎，清人有陳啟源。此五人批判朱熹淫詩說之言論，都成為好古援以證己之證詞。好古於〈溱洧〉引王道之言，意在批判朱熹視〈鄭詩〉二十一篇全為淫詩。然而朱熹於《詩集傳》

¹⁰⁵ 以上二引文，同前註，卷 12，頁 6b、8a。

¹⁰⁶ 以上二引文，同前註，卷 12，頁 8b。

¹⁰⁷ 同前註，卷 4，頁 12a。

¹⁰⁸ 江口尚純：〈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序說〉，頁 52。

¹⁰⁹ 可參考張文朝：〈仁井田好古的《詩經》觀及其對朱熹之批評〉，頁 206-208。

只說「〈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¹¹⁰而未言全為淫詩，且檢視王純甫之原文，亦可知王純甫承認〈野有蔓草〉、〈溱洧〉二篇確為淫泆之辭，〈丰〉為可疑而難決者。¹¹¹此固與好古所言不盡相同，實好古有所選擇，以符己說所致。就朱熹二十三首淫詩而言，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批朱者達二十首，僅〈有狐〉、〈丘中有麻〉、〈東門之墀〉無批，可知何楷對朱熹淫詩說頗不以為然。林慶彰即指出何氏不用朱熹淫詩說，謂：「何氏既不認為《詩經》中有淫詩，朱子的淫詩說雖然引起很大的回響，在何氏看來根本不成問題。所以，何氏在論定各詩篇詩旨時，幾乎不採用朱子的淫詩說。」¹¹²而好古引其中之十一首以批朱，頗忠於何楷原意，並無增刪之處。被譽為清初考證學之先驅者之陳啟源，¹¹³其《毛詩稽古編》除〈有狐〉、〈木瓜〉、〈有女同車〉、〈薺兮〉、〈丰〉、〈東方之日〉等未見批朱外，其餘皆有所批。¹¹⁴好古引五首，盡同於其說。郝敬《毛詩原解》例以「朱子改為……，非也。」批朱，此二十三首除〈東門之墀〉外，無一倖免。因此，蔣秋華說：「此書尊信《詩序》，力駁朱《傳》不信《序》說的不當。其他的重要論點，也幾乎是圍繞著朱子而批判的。」¹¹⁵此說良有以也。好古五引其說，以為己意，是好

¹¹⁰ 朱熹：《詩集傳》，頁 481。

¹¹¹ 「論鄭、衛二國風，曰：『鄭風二十一篇，其的為淫泆之辭者，〈野有蔓草〉、〈溱洧〉二篇，可疑而難決者，〈丰〉一篇而已。』」收錄於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0 冊，卷 1，頁 610。

¹¹² 林慶彰：〈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 期（1994 年 3 月），頁 326。何楷在中國《詩經》學史上之地位，由山西大學劉毓慶教授評之為：「他對《詩經》研究的巨大貢獻非一般經師可比。」可知其重要性。參考劉毓慶：〈何楷的《詩》學貢獻〉，《晉陽學刊》（2000 年第 2 期），頁 54。

¹¹³ （日）江尻徹誠：《陳啟源の詩經學——《毛詩稽古編》研究》（北海道：北海道大學出版會，2010 年），頁 94-98。

¹¹⁴ 「所辨正者，為朱子《集傳》為多」、「所掊擊者，惟劉瑾《詩集傳通釋》為甚，輔廣《詩童子問》次之。」可見陳啟源所批判的確實以朱熹《詩集傳》為主，其中又以淫詩說為多。參考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頁 350。

¹¹⁵ 蔣秋華：〈郝敬的詩經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2 期（1998 年 3 月），頁 290。

古同於郝敬之證。雖不見今人對韋調鼎《詩經備考》之評價，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謂：「是編，因鍾惺未成之本，增損成書，以攻擊朱子《集傳》。夫《集傳》排斥毛、鄭，固未必盡，無遺議，先儒亦互有異同。然非鍾惺等所可置議也，況又拾惺之餘緒乎？」¹¹⁶則可知好古二引其說，亦取其為攻朱之故。計《詩經備考》於此二十三首中，反朱者十：〈桑中〉、〈木瓜〉、〈丘中有麻〉、〈將仲子〉、〈薤兮〉、〈丰〉、〈風雨〉、〈子衿〉、〈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贊朱者二：〈靜女〉、〈大車〉；既反《序》又反朱者三：〈有狐〉、〈采葛〉、〈遵大路〉；部分贊朱部分反朱者三：〈山有扶蘇〉、〈狡童〉、〈褰裳〉；無評者五：〈有女同車〉、〈東門之墀〉、〈揚之水〉、〈溱洧〉、〈東方之日〉。據此，則此書確實以反朱者為多，但亦有不少反《序》者。好古僅取反朱而不取其反《序》者，其護《序》之態度可知矣。

以上論古義學派學者之淫詩觀。仁齋認為《詩》中有淫詩，雖然不明承自何人，但可與其聲、詩之思辯相通。東涯一面繼承仁齋《詩》道人情之說，而承認淫詩有觀風之功能；另一面卻為批判朱熹，不承其淫詩說，而視為刺淫之詩，以致造成其在論辯上產生矛盾。三角根據〈小序〉，繼承東涯刺淫之說，東所則繼承仁齋之說及東涯淫詩可觀風之說，且在其著作中落實有淫詩十二篇之存在。好古繼承東涯以來刺淫之說，不認為有淫詩。就淫詩是否為「淫奔者自作」而言，仁齋雖認為有淫詩，但因人皆有羞惡之心，不可自發其奸，所以排斥朱熹之說法。仁齋此觀點，除東所認為並非全是外，為古義學派學者所繼承，可視為古義學派之基調。但何以只有伊藤東所支持「淫奔者自作」說？筆者以為正是因為古義學派學者相信〈小序〉乃古來相傳之說，合乎其所主張之古義，故多就〈小序〉刺淫之立場說詩。而東所則是就詩本身一一考究後，發現確實有「淫奔者自作」之淫詩存於《詩經》中。此是東所異於他人，而有自己之意見之故。

¹¹⁶ 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頁 373。

就古義學派內部學說之傳承而言，一般認為東涯乃以祖述仁齋之學為主，然經本文析論後，發現除主張淫詩非為淫奔者自作相同外，大部分不與其父同調。而蘭嵎、三角、東所則與東涯同路；但三角時有直承仁齋之處，東所則跳過蘭嵎，繼承東涯之說。顯見仁齋之後，京都古義堂教學論點以東涯之學說為主。而身處東北秋田之梅鄰，則以仁齋之師說為主；居伊勢之三角，雖為東涯之學生，但時有上通於仁齋之處；處於南方紀州（今和歌山）之好古，有同於仁齋，亦有同於東涯，頗符合好古對二人崇敬之結果。就古義學派學者引中國學者學說之異同及其態度而言，如仁齋用鍾惺、丘濬「活物」之說；三角用朱謀埠「措諸文詞是為詩，被諸管絃音律是為聲」之語。其說雖皆同於中國學者，但因無表明出處，易使讀者以為出於作者之意。而東涯、蘭嵎、東所皆認同田汝成「鄭聲，非〈鄭詩〉」之說，而引用之。然僅蘭嵎以聲為歌聲，而不信其以聲為樂之說，是蘭嵎有所反思，而異於明儒之處。蘭嵎除認同田汝成之說外，亦同意程敏政之「放鄭聲」說，而蘭嵎置程氏「聲、詩有同質性」之觀點於不顧，是其說不備之處。好古大致引用明、清學者中與己同意之論說，以明己志。

綜觀古義學派內部學說之傳承中，蘭嵎的經解較為開放，而有跳脫伊藤家學詩說的現象。蘭嵎何以有此種脫離伊藤家《詩經》學說之解釋？筆者以為除接受、反省明代學者之說外，日本學界也因時代學術風氣之轉移，蘭嵎須面對古文辭學派、折衷學派學說之崛起，而對家學詩說有所調整。就此現象而言，顯示出江戶《詩經》學史因古文辭學派、折衷學派等新學派出現之外部因素，盛極一時的古義學派其內部之發展，亦產生與之交流互動之變化。如前所言，東所曾評蘭嵎之《詩古言》謂：「季父蘭嵎，著《詩古言》，推時世，詳訓詁，亦不拘家庭之誨，別發揮一家之卓見。其說浩博，不可涯涘矣。」東所所謂「其說浩博」，可作為蘭嵎不堅守一家之言，而能廣納眾說之旁證。若蘭嵎只堅守伊藤家學，而不能與外界眾家之學有所交流，恐怕無法有此能耐。東所雖有叔父蘭嵎之教導，然以其將繼承伊藤家學之身分的立場而言，常有繼承父祖遺教之志，故有跳過蘭嵎而繼承仁齋與東涯之舉。於詩之講學而言，他曾說過：「然講詩之日，每以乖父祖之遺說，不快心焉！欲為之注解，然無考究之博，無強

識之力，欲為不能也。」¹¹⁷可知東所所言「每以乖父祖之遺說」，很可能即是指蘭嵎以其自己之學說教導下，東所覺得叔父所教與父祖之遺說不同，而心中不悅。由此可知東所之處境，然此又可作為提供蘭嵎不堅守伊藤家言之另一佐證。私淑仁齋、東涯父子之古義學代表學者仁井田好古著《毛詩補傳》，其首條〈條例〉謂：「《傳》文簡奧，其不足者，主取鄭、孔。鄭、孔不通，然後蒐羅諸家而折中之，或下私說，以補成其義。」¹¹⁸可見好古以漢說為主，而折中諸家之為學立場。然而時至江戶後期，幕府於寬政二年（1790）實施「異學之禁」，禁止朱子學外之講學。就《詩經》學而言，好古慨歎：「明初定科舉之制，獨取朱《傳》以著功令，學者靡然從風，然後天下無復古學矣，豈可不掩卷而三嘆也哉？」¹¹⁹他對於中國明朝這種「獨取朱《傳》至今天下無復古學」的學風，深表遺憾。但同時他更憂心當時的日本學術環境，說：「此風延及 皇國，毛、鄭雖存，皆絀而不講，古義湮晦，莫甚於此。」¹²⁰亦即好古認為若只講朱子學，將導致毛、鄭《詩經》學後繼無人。此傳達了江戶後期古義學派在《詩經》學研究的發展上，確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傳承危機。因此，好古窮盡三十餘年撰寫《毛詩補傳》以「闡明古義」，¹²¹「以繼千歲之絕響」，¹²²以明其終身傳承古學之志。所以好古雖廣引明、清學者研究之成果，說《詩》時仍採取堅守古義學派以《序》說《詩》的研究立場。

¹¹⁷ 伊藤東所：《詩解・釋例》，頁 23a。

¹¹⁸ 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頁 24a。

¹¹⁹ 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進毛詩補傳啟》，頁 1b。

¹²⁰ 仁井田好古：《樂古堂文集》，關儀一郎編：《續續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1978 年），第 3 冊，卷 2，頁 35。

¹²¹ 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序》，頁 3b。

¹²² 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上世子進毛詩補傳啟》，頁 3a。

四、古義學派批評朱熹淫詩說對日本學界之影響

眾所周知，日本江戶時代學派林立，以儒學為宗者，即有九大學派之多。¹²³然除古義學派學者對朱熹淫詩觀有所批評外，同時代之其他學派有無受古義學派淫詩觀之影響？古義學派之成立，始於 1662 年仁齋於京都自宅開塾授徒，此年前後，仁齋因不滿朱子學之註釋有佛、老思想，開始質疑朱子理氣、心性之學，非為純正儒學，而主張直接回歸《論》、《孟》原典，直溯孔、孟思想，究明古義，以實踐仁道。故此學派之基本立場，乃以批判朱子學為主。但即使同為古義學派，因時代遞嬗，學術風氣轉移，七位古義學派學者各自面對之學術環境也不盡相同。仁齋時代學術以朱子學為主流，因此，欲脫離朱子學而立足於學術界之古義學，勢必要與朱子學正面對決；同樣，梅鄰與東涯，則須面對古文辭學派之崛起與勢如破竹之擴展；蘭嶠、三角、東所，則除古文辭學派之外，更須與折衷學派抗衡；好古則須面對折衷考證學派之衝擊。因此，為因應當時之學術風氣，對於自家學問亦時有修正之現象。

江戶時代初期最早出現的是朱子學派，以擁護朱子學為宗，對淫詩觀並無反對之意見。同以朱子學為宗的另一支學派是敬義學派，創始人山崎闇齋（1619-1682）摘錄朱子著作、《語錄》中之精華，編著《文會筆錄》二十卷，其中有不少與朱熹《詩集傳》相關之記錄，以其持有「學朱子而謬，與朱子共謬也，何遺憾之有？」之態度，¹²⁴則於淫詩說亦可知其尊朱之堅定矣。中江藤樹（1608-1648）所開創之陽明學派及幾乎與古義學派同時成立之山鹿素行（1622-1685）聖學派，皆無涉及淫詩說。因此，江戶時代初期，仁齋、梅鄰

¹²³ 參考張文朝：〈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儒學各派創始者思想述介〉，收入張曉生主編：《儒學研究論叢》（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儒學中心，2009 年），第 2 輯，頁 27-45。

¹²⁴ 日本古典學會編：《新編山崎闇齋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78 年），卷 4，頁 410-411。

等古義學派學者提出反駁朱熹淫詩說之舉，明顯有異於同期各派學者之觀點，可視為此學派之特色。

再者，審視古義學派學者淫詩觀，對江戶時代中期以後他派學者之影響，則可發現自荻生徂徠（1666-1728）創立古文辭學派後，除批判朱子學，也視古義學為勁敵，對仁齋之《論》、《孟》古義之解釋多所批判，即使在《詩》觀上亦略有微詞。但就淫詩觀而言，則無直接之關連性。唯徂徠引楊慎「聲濫於樂，曰淫聲。」「後世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等言，以為「此說為是」。¹²⁵是可知徂徠採取批判朱熹之說為非的態度，同於古義學派。徂徠說：「《詩經》中有很多淫奔之詩，朱《注》雖欲使之為懲惡，却反成為導淫。」¹²⁶明白指出《詩經》中有淫詩，較諸東涯更為明確，但不承認朱熹淫詩有懲惡功能之說法。¹²⁷徂徠此說同於東涯，而異於仁齋。又，徂徠之學生太宰春臺（1680-1747）謂：「《論語》及《樂記》所云，一曰聲，一曰音，而未始曰鄭、衛之詩，彼特言二國聲音之淫耳。所謂聲音者，人聲器音是已。其實二國之詩，豈必皆淫奔之言哉？唯其人之所歌，與器之所和，皆為淫聲，故君子惡之。君子之所惡，惡其淫聲耳，非惡詩也。」¹²⁸春臺此說似有古義學派之氣味，或有所承。但分聲音為人聲、器音，卻是扼要明白，非古義學者所能出其左右者。春臺之學生渡邊蒙菴（1687-1755）《詩傳惡石》亦引《樂記》之言以批朱，說：「淫

¹²⁵ 以上三引言，見荻生徂徠：《論語徵》，收入（日）小川環樹編：《荻生徂徠全集》（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年），卷4，頁233。

¹²⁶ 「《詩經》は淫奔之詩多く有之候。朱《注》には惡を懲しむる為と有之候へ共。却て淫を導く為に成可申候。」見荻生徂徠：《徂徠先生答問書》，收入（日）島田虔次編：《荻生徂徠全集》（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年），卷1，頁484。

¹²⁷ 「勸善懲惡」這一觀點，來自朱熹解釋《論語·為政》「思無邪」，而「思無邪」與「溫柔敦厚」一般將之視為詩教的議題。本文為筆者「日本江戶時期古義學派對朱熹詩觀之批評」系列中的一篇，所以本文暫不論及此議題，而留待「日本江戶時期古義學派對朱熹詩教說之批評」時再論。

¹²⁸ （日）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收入（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1971年），第11冊，頁17-18。

聲煩乎？其罪在人，鄭、衛之詩，何可罪哉？朱子不知詩之與聲音自別，故往往其論爾。」¹²⁹ 以上數例不難看出古文辭學派也都以《論語》與《樂記》所言，論詩與聲音有別，以駁朱熹誤聲為詩。而此批判態度雖同於古義學派，但能否就此斷言古文辭學派受古義學派影響？由於迄今尚未發現古文辭學派之學者有明顯引用古義學派學者淫詩言論之相關文獻，所以筆者持保留態度。然以徂徠攻擊仁齋學之甚觀之，對徂徠學而言，仁齋之學有其不可磨滅之存在。就此意義而言，古文辭學派受古義學派影響之可能性，難以謂之無。

比古文辭學派稍後成立之折衷學派（包括折衷考證學派），雖然採取不偏朱子學、陽明學、古學（包括聖學派、古義學派、古文辭學派）之為學態度，卻無論及古義學批評朱熹淫詩說，而無法得知其態度為何。例如折衷學派代表學者井上金峨（1732-1784）、折衷考證學派代表學者大田錦城（1765-1825），皆無涉及淫詩說。由上所述，江戶中期以後之學術界，除古文辭學派外，似無對古義學淫詩觀提出批評者。

至明治時期，內田春端著《詩經講義》（1880-1889年），折衷於《序》與朱熹之間，承認有淫詩；小宮山綏介（1830-1896）著《詩經講義》（1893年），以宗朱說為主；林英吉著《詩經講義》（1897年），據古注，而折衷諸家，承認有淫詩；根本通明（1822-1906）著《毛詩》（1900年），依古注，批評朱熹淫詩說。然以上各書，皆無一提及古義學派學者之淫詩觀。唯山本章夫（1827-1903）著《詩經新註》（1903年），二十餘萬言，尊朱說，承認今本《詩經》中有淫詩，認為此乃起因於秦火後漢儒補足詩篇之故。章夫此觀點與朱熹不同，而同於東涯。且認為淫詩非淫奔者自作之觀點，亦同於仁齋，顯示章夫雖以朱子學為本，但於淫詩觀上，頗通於古義學派之思想。因此，筆者認為章夫之《詩經新註》值得日後進一步探討。明治末大正初竹添光鴻（1842-1917）著《毛詩會箋》（1920年），成代之巨著，雖引仁井田好古數條，然亦與

¹²⁹（日）渡邊蒙菴：《詩傳惡石》（靜岡縣濱松市立圖書館藏，1753年寫本），頁15b。

古義學淫詩說無涉。¹³⁰至此或可稍微說明古義學派朱熹淫詩說之批評，對日本學術界似無多大之影響。而究其原因，或與當時學術風氣之轉移有關。因為自從古義學創立後，朱子學深受打擊，至古文辭學派興起後，學界對朱子學的關心度更是一落千丈，其慘狀可想而知。時至後期初，甚至需要幕府提出，除朱子學外，禁止講學的「異學之禁」（1790年）加以保護，才漸有起色。但此時又有折衷學派之出現及清代考證學派之傳入，學者對學問內容的關心有分散（不獨尊某一學派）與轉向（漢代之學）的趨勢。在此情況下，致使除朱子學內部的討論外，其他學派較少論及朱熹的淫詩觀，雖有古義學派的批判，但終究未能引起大多數學者的關心。

五、結 論

如上所論，古義學派學者對淫詩問題之解釋，可歸納為：該派學者從先人及古籍中取得對《論語》「鄭聲淫」、「放鄭聲」等解釋，探討鄭聲是否即為〈鄭詩〉，由此推論鄭聲淫是否等同〈鄭詩〉淫，並以此批判朱熹解釋孔子所言「鄭聲淫」是否即為〈鄭詩〉淫，進而討論《詩經》中是否有淫詩之存在，淫詩之作者是否即如朱熹所言為淫奔者之自作。而有《詩經》註解專著之蘭嵎、三角、東所、好古等人則透過註解〈序〉文、經文，傳達對淫詩之觀點。經本文研究結果顯示：

（一）就古義學派學者對樂、聲與詩之論述而言，持樂、聲與詩同之意見者，大多同於詩、詞、歌、聲、音、樂，雖因各自位於始末不同階段而有不同之名稱，實為一體。而持異見者，大多將詩與樂置於六經之範疇下而論，故得

¹³⁰ 以上書目資料如下：（日）內田春端：《詩經講義》（東京：中外堂，1880-1889年）；（日）小宮山綏介：《詩經講義》（東京：博文堂，1893年）；（日）林英吉：《詩經講義》（東京：興文社，1897年）；（日）根本通明：《毛詩》（東京：哲學館，1900年）；（日）山本章夫：《詩經新註》（京都：山本讀書室，1903年）；（日）竹添光鴻：《毛詩會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年）。

《詩》與樂異之結果。

（二）綜觀古義學派內部學說之傳承，就淫詩觀而言，仁齋之後，京都古義堂以東涯之學說為主要教學論點。就淫詩為淫奔者自作而言，仁齋因人皆有羞惡之心，而否定朱熹之說，可視為古義學派之基調，只有東所贊同朱熹之說。筆者以為古義學派內部有此基調，正因為古義學派學者相信〈小序〉乃古來相傳之說，合乎其所主張之古義，故多就〈小序〉刺淫之觀點說詩。而東所則是就詩篇本文考究後，發現確有「淫奔者自作」之淫詩存在。此是東所異於他人，而有己意之故。蘭嵎的經解較為開放，筆者以為除接受、反省明代學者之說外，也因時代學術風氣轉移，而對家學詩說有所調整。此一現象顯示江戶《詩經》學因古文辭學派、折衷學派等新學派出現之外部因素，使古義學派內部之發展亦產生與之交流互動之變化。時至幕末，仁井田好古因見朱子學受幕府保護，憂心古學可能後繼無人，因此在解《詩》時，堅守以《序》說《詩》的研究立場。此傳達出江戶後期古義學派在《詩經》學研究的發展上，確實遭遇前所未有的傳承危機。就古義學派學者引中國學者學說之異同及其態度而言，如仁齋之用鍾惺、丘濬之說，三角之用朱謀埠之語，然皆用而不宣。而東涯、蘭嵎、東所皆以田汝成之觀點為說，僅蘭嵎不信其說，是異於他人之處。蘭嵎亦同意程敏政之「放鄭聲」說，然不顧其「聲、詩有同質性」之觀點。好古選用與己同意之明、清學者之論以為己說。

（三）就古義學派批評朱熹淫詩說對日本學界之影響而言，因時代學術風氣轉移，古義學派學者各自所要面對之學術環境也不盡相同。因此，時有修正自家學問之現象。於江戶初期，提出反駁朱熹淫詩說之舉，可視為古義學派之特色。中期以後，除古文辭學派與之同調外，不見其他學派有引古義學派批評朱熹淫詩說之言論。至明治時山本章夫之《詩經新註》於淫詩觀上，頗通於古義學派之思想，值得再行探討。明治末大正初之竹添光鴻雖引好古數條，然亦與古義學淫詩說無涉。此說明：就古義學派朱熹淫詩說之批評而言，對大正以前之日本學術界影響有限。至於大正以後之影響，仍有待他日專文討論。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朱傑人等整理：《毛詩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漢·司馬遷：《史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漢·張機撰，西晉·王叔和編，金·成無己註：《傷寒論注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 宋·程大昌：《考古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 宋·朱熹：《詩序辨說》，收入朱傑人等校點：《朱子全書》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 宋·朱熹：《詩集傳》，收入朱傑人等校點：《朱子全書》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明·朱朝瑛：《讀詩畧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明·朱謀瑋：《詩故》，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明·朱橚：《普濟方》，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明・田汝成：〈放鄭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 明・田汝成：《田叔禾小集》，收入清・丁丙輯：《武林往哲遺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5年。
- 明・林有望輯：《新刊晦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辯》，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 明・程敏政：〈詩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張次仲：《待軒詩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黃生：《義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 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日）伊藤仁齋：《語孟字義》，收入（日）井上哲次郎等編：《日本倫理彙編》，京都：臨川書店，1970年。
- * （日）伊藤仁齋：《論語古義》，收入（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鳳出版，1973年。
- （日）平元梅鄰：《讀詩私說》，秋田：日本秋田縣大館市立圖書館藏，元文二年（1737）寫本。秋田縣立圖書館同。
- （日）荻生徂徠：《徂徠先生答問書》第1卷，收入（日）島田虔次編：《荻生徂徠全集》，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年。

- (日) 荻生徂徠：《論語徵》，收入(日)小川環樹編：《荻生徂徠全集》第4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年。
- (日) 荻生徂徠：《護園隨筆》，收入(日)西田太一郎編：《荻生徂徠全集》第17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76年。
- (日) 伊藤東涯輯：《鼎錫經學文衡》，京都：平安書坊奎文館，1734年。
- (日) 伊藤東涯：《讀詩要領》，收入(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1978年。
- (日) 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收入(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1971年，第11冊。
- (日) 渡邊蒙菴：《詩傳惡石》，濱松：靜岡縣濱松市立圖書館藏，1753年寫本。
- (日) 伊藤蘭嶠：《詩古言》，天理：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寬延三年(1750)自筆本。
- (日) 奧田三角：《詩經國風詁解》，三重：三重神宮文庫藏，明和元年(1764)寫本。
- (日) 伊藤東所：《詩解》，天理：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寬政十一年(1799)寫本。
- (日) 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京都：紀州樂古堂，1834年。
- (日) 仁井田好古：《樂古堂文集》，(日)關儀一郎編：《續續日本儒林叢書》第3冊，東京：鳳出版，1978年。

二、近人論著

- 林保淳：〈「淫詩」與「淫書」〉，《淡江中文學報》第4期(1997年12月)。
- * 林慶彰：〈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
- 張文朝：〈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儒學各派創始者思想述介〉，收入張曉生主編：《儒學研究論叢》，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

術學院儒學中心，2009 年。

張文朝編譯：《江戶時代經學者傳略及其著作》，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年。

張文朝：〈域外漢學另一章：日本江戶經學家仁井田好古〉，《漢學研究通訊》第 34 卷第 1 期（2015 年 2 月）。

* 張文朝：〈仁井田好古的《詩經》觀及其對朱熹之批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7 卷（2015 年 9 月）。

張文朝：〈《論語古義》中所見伊藤仁齋之《詩經》觀〉，《清華中文學報》第 15 期（2016 年 6 月）。

許雯怡：《《詩經·鄭風》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文幸福先生指導，2011 年。

* 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 年。

黃忠慎：〈朱熹「淫詩說」衡論〉，《靜宜中文學報》第 6 期（2014 年 12 月）。

劉毓慶：〈何楷的《詩》學貢獻〉，《晉陽學刊》2000 年第 2 期。

蔡根祥：〈朱熹詩集傳鄭風淫詩說平議〉，《孔孟月刊》第 25 卷第 1 期（1986 年 9 月）。

蔣秋華：〈郝敬的詩經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2 期（1998 年 3 月）。

賴炎元：〈朱熹「淫詩說」考辨〉，《孔孟月刊》第 31 卷第 7 期（1993 年 3 月）。

（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年。

（日）小宮山綏介：《詩經講義》，東京：博文堂，1893 年。

（日）山本章夫：《詩經新註》，京都：山本讀書室，1903 年。

（日）內田春端：《詩經講義》，東京：中外堂，1880 年 -1889 年。

（日）天理圖書館編：《古義堂文庫目錄》，奈良：天理大學出版部，1956 年。

（日）日本古典學會編：《新編山崎闇齋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78 年。

（日）江口尚純：〈伊藤東所《詩解》考略〉，《中國古典研究》第 52 號（2007 年 12 月）。

- (日) 江口尚純：〈伊藤東所之詩經學〉，《詩經研究》第 32 號（2007 年 12 月）。
- (日) 江口尚純：〈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序說〉，《中國古典研究》第 55 號（2013 年 12 月）。
- (日) 江尻徹誠：《陳啟源の詩經學——《毛詩稽古編》研究》，北海道：北海道大學出版會，2010 年。
- (日)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 年。
- (日) 林英吉：《詩經講義》，東京：興文社，1897 年。
- (日) 根本通明：《毛詩》，東京：哲學館，1900 年。
- * (日) 清水徹：〈伊藤仁齋的《詩經》觀〉，《東洋文化》第 100 號（2008 年 4 月）。
- (日) 種村和史：〈詩を道德の鑑とする者——陳古刺今說と淫詩說から見た《詩經》學の認識の變化と發展〉，《橄欖》第 17 卷（2010 年 3 月）。
-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W.-Ch. (2015). Kō'ko Niida's views of the *Book of odes* and his criticism of Zhu X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47(2015-9), 173-216.
- Cheng, D.-Ch. (1983). *Kaogu bian* [A book of verification]. In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852*.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Huang, Zh.-Sh. (2002). *Zhuzi Shijing xue xintan* [A new exploration of Zhu Xi's studies on *The classic of poetry*]. Taipei: Wu-Nan.
- Ito, Jinsai. (1973). *Rongo kogi* [The ancient meanings of *The analects*]. Tokyo: Otori.

-
- Ji, Y., et al. (Eds.). (1983). *Qinding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general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In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Vol. 1*.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Lin, Ch.-Ch. (1994). Summary of a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Ho K'ai's *Shih-ching shih-pen ku-y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4(1994-3), 319-348.
- Mao, H. (Annot.). (2013). *Maoshi zhushu* [The Mao Poetry with annot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 Shimizu, T. (2008). Yiteng Renzhai de *Shijing* guan [On Ito Jinsai's view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Studies of Asia*, 100, 12-26.
- Zhu, X. (2002). *Shi jizhuan* [A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In Zhu J.-R. et al. (Annots.), *Zhuzi Quanshu*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Xi]: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Zhu, X. (2002). *Shixu bianshuo* [A criticism of *The great preface to the classic of poetry*]. In Zhu J.-R. et al. (Annots.), *Zhuzi Quanshu*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Xi]: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